關於先周歷史的新認識

杜 正 勝

所謂「先周」是指周人克殷，建立周朝以前的階段。現在學術界使用這詞尤有特別義涵，即專指上述那段時間周部族及融合於周族之諸部族的歷史，和一般純粹表示時代段落的「先秦」「先漢」不同，所以討論先周歷史，當以周部族的興起史爲主。周人集中國古典文明之大成，純就歷史考證而言，我們應有責任將他們發跡的情形疏理清楚；何況最近出土的新資料以及學者的新解釋，使這個問題的討論日趨熱烈，讓我們深切體會到今日研習古代歷史遠比前人深邃細密。

討論先周歷史集中在周部族興起的地域、時間以及族屬的認定。傳統認爲周人起於關中偏西之地及涇水中游，本世紀三〇年代初，有人根據歷史地理考訂，主張周之祖先原在山西，後來才遷到陝西（錢穆 1931 ）。此一說法在半世紀後獲得少數考古學家的呼應（鄒衡 1979 、 1980 、 1988 ），也有一些歷史學者支持（王玉哲 1982 ，許倬雲 1984 ）。周族源於山西說雖然猶有堅持者（鄒衡 1988 ），但傳統說法在新出資料的印證下，也賦予新的生命力。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的結合，從先周文化或歷史的討論，愈發顯得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於引進考古學，先周歷史研究乃脫離傳統歷史地理學的考據窄門，進入文化分析的範疇，接觸到族屬認定的難題。目前考古學及古史學界雖然尚存在著極大的歧異，理亂治紛之道，我們主張先考訂文獻，釐清周族興起的年代及主要活動地區，再和現代的考古新知識互相印證。希望對於先周的文明或歷史能夠獲得一些比較清晰的頭緒。

一、周族先公時期的年代與地理

克殷以前周族的傳說和歷史可以分作三大階段，一是后稷誕生，爲周族之始；二是公劉居豳，爲先周時期周人比較長久的活動地域；三是太王遷岐，周族從涇水中游進入關中，開啓爭霸中原的端倪；最後是太王孫子文王摶凝「西土」意識（杜正勝 1991 ），先爲西方諸侯之長，稱「西伯」，後來與商並稱王，奠定克商基業；至其子武王遂代紂而爲天下共主，建立周王朝（參用《史記・劉敬列傳》婁敬之說）。太王、王季到文王（前兩代之「王」是追尊），皆在武王正式爲

天下王以前，算作先王時期；那麼，自后稷至太王，不妨稱作先公時期。

茲先檢討周族先公時期的年代問題。

先公時期周族的歷史相當迷蒙，尤其始祖棄，謹慎的學者直以神話人物視之。根據舊史，棄號后稷，知其母，不知其父，長大留在母族。世界各民族對於他們始祖的誕生和成長，多有非常神奇的傳說，周人之於棄亦然，首先大概口耳相傳，到西周初期才記錄下來，今傳有《大雅》的〈生民〉篇。詩首章曰：

> 厥初生民，時（是）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祓）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是）維后稷。

姜嫄踏到上帝拇指足跡而懷孕，遂生后稷。此即所謂感生神話，近人嘗試予以民族學或民俗學的解釋，或謂處於母系社會，或謂野合；[1]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西周初期，周人傳述始祖誕生故事時，已舉不出其父之名氏或部族了。

上帝之子，故多靈異。〈生民〉第二章歌頌帝子誕生如小羊一般順利，母親不傷不害，都是上帝顯赫的緣故。不過，在人間，無夫而居然生子，視爲不祥，於是

>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這是他名作「棄」的緣由。棄自幼兒即善於種植，

> 藝（藝）之荏菽，荏菽旆旆（長大也），禾役穟穟（美好也），麻麥幪幪（茂盛也），瓜瓞唪唪（多實也），

後遂爲農正，故號「后稷」。

棄之爲上帝子，春秋前期的《魯頌・閟宮》說得更直截了當，曰：

>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鄭《箋》云：「依，依其身也。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憑依而降精氣」。精氣云云是比較晚的觀念（杜正勝 1989 、 1991 ），不過原始民族多相信始祖是天帝所生，周人關於后稷的神話傳說，就今日民族學觀點而言，毋寧是自然之事。

然而文明稍進，人天懸隔後，遂覺不妥貼，於是在傳說的人王中爲始祖安排一個父親，《史記・周本紀》的帝嚳即是這樣的產物。殊不知這麼一來，后稷遂

1. 母系社會說見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頁 25。野合說，嘗如聞一多推測「當時實情祇是耕時與人野合而有身，後人諱言野合，則曰履人之迹，更欲神異其事，乃曰履帝迹耳。」詳〈姜嫄履大人跡考〉，《神話與詩》頁 73～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商始祖契、唐堯、帝摯都成爲同父異母的兄弟了，而且他還是元妃之子呢！[2] 用後世的話說，即是嫡長子。根據此一傳說系統，帝嚳之四妃生四子，老四、老三先後親登帝位，老大、老二待其苗裔才分別成爲商、周二朝的人王，而且都在他們身後十幾二十代。這眞是奇談！更有進者，元妃之子不但未及身繼承帝位，連子孫也最後才稱王，可見這個傳說系統多麼脆弱。當然，這是希臘萬神殿式神話整合的結果，而且是周人造出來的系統，推尊后稷之母爲帝嚳的元妃，不外抬高周人的歷史身價。帝嚳之子的神話如果不徹底拋棄，對周族先公的年代是不可能得到比較合理的估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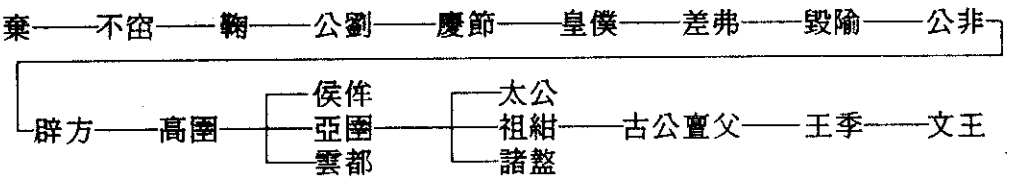
司馬遷說：「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史記・三代世表》）。未開化民族對於年數多不精確，往往膨脹得不合情理，太史公所讀古史傳說時代的年曆資料蓋亦不例外。不過，他們倒精於記誦譜諜，如果慎用世系，是不難推測其大致年代範圍的。

《史記・周本紀》所錄周族先公的世系是這樣的：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即是太王，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上列譜系，從棄至太王，父子相傳共十四代。然而公劉以下別有異說，《集解》《索隱》引證的《系本》還有「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以及「太公組紺諸盩」等名字。皇甫謐認爲這裡只指四人，上名下字，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太公，基本上維持〈周本紀〉的世代。不過司馬貞作《索隱》已發現皇甫的解說不妥當，他根據《漢書・古今人表》班固自注「雲都，亞圉弟」，而懷疑辟方、侯侔亦另外二人之名。這是對的。〈古今人表〉的世系比〈周本紀〉多辟方、夷竣、雲都三人。這段譜系，〈古今人表〉及班固自注這麼列：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竣（高圉子）、亞圉（高圉子）、雲都（亞圉弟）、公祖（亞圉子）、大王亶父（公祖子）。按照「公非辟方」和「亞圉雲都」分指四人的體例，《系本》「太公組紺

2.《史記》〈周本紀〉：「姜原爲帝嚳元妃。」〈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五帝本紀〉「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陬訾氏女，生摯。」放勳即帝堯。據《正義》引《帝王紀》帝嚳四妃的次第依序是姜嫄、簡狄、陳豐（鋒）氏女和陬訾氏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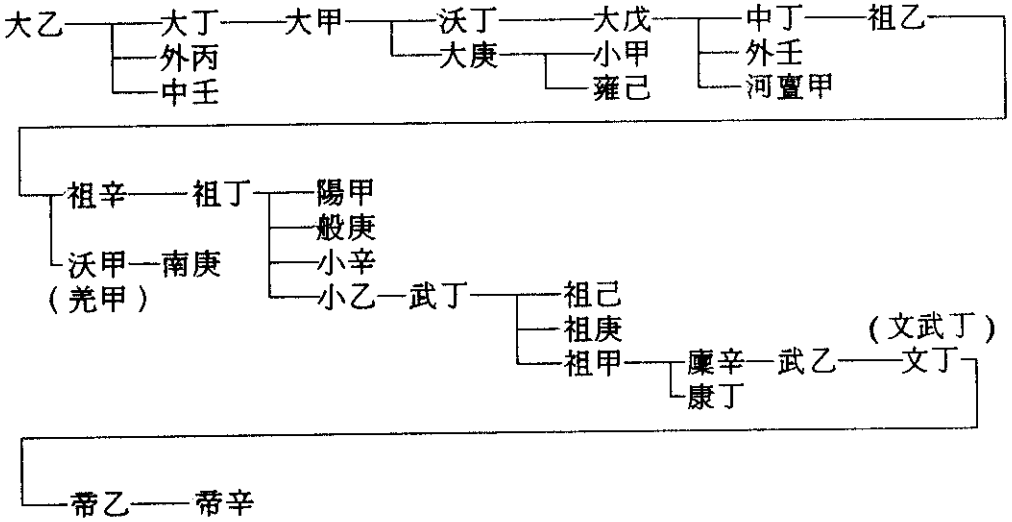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諸盩」恐怕也如高圉之三子，是三個人，而且可能兄弟行。[3]〈古今人表〉夷竣當即〈周本紀〉的侯侔。[4]於是參酌〈周本紀〉《系本》和〈古今人表〉三種史料，得到周族先公先王世系如下：



周開始興盛坐大是在文王時代，自文王上推十六世是棄，與春秋晚期衛國大夫彪傒所說「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國語・周語下》）大抵符合。

不論十五或十六世，大抵都落在歷史上商王朝的時代內。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圖」（據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卜辭世系表」校）述大乙成湯以下的世系是



古本《竹書紀年》云：「文丁殺季歷」。季歷死，其子文王繼位。就商王世系而言，文丁傳子武乙，武乙傳子帝辛（紂王），文王與商紂並世，可見周文王享國

3. 《系本》「太公組紺諸盩」，《史記・周本紀・索隱》曰：「〈三代世表〉稱叔類」。（余按今本〈三代世表〉作公祖類）。既曰叔，上必有伯長，故疑《系本》的太公、組紺與諸盩三人如高圉三子侯侔、亞圉、雲都一樣，是兄弟行輩之人。亦參看崔述《豐鎬考信錄》卷一，收入《崔東壁遺書》。

4. 夷竣，〈古今人表〉師古注曰：「竣與俊同」。按，「侯」古作「矦」，傳寫或誤作「夷」，「俊」也可能誤作「俟」，故侯侔可能即夷竣。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網路資料庫

甚久，年歲甚長，[5] 他主要活動的時間從文丁晚期經帝乙到帝辛三世。核對商王及周之先公先王世系，文丁上溯至開國之君成湯，計十五世，等於周文王到不窋。不窋據說是后稷之子，其末年，值夏后氏政衰（《史記・周本紀》），因此周族始祖棄的年代大概稍早於成湯。此一推斷也可從祀典獲得旁證。晉國史官蔡墨說：

>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左傳》昭二十九）。

《禮記・祭法》亦曰：

>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厲山氏即烈山氏。稷乃農正之官銜，不是私名。按諸蔡墨與〈祭法〉，周棄在夏末繼烈山氏而任職農正，殷商以下遂被祀爲農神，那麼周族的本源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際，這結論與世系的推測正可呼應。

關於周棄爲帝嚳之子的傳說較晚才產生。較早階段是棄與禹、契同在虞舜之廷任職。西周中期的祭公謀父說過：「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國語・周語上》）。按此說，后稷時代橫跨虞夏，故《尚書・堯典》謂棄與禹、契同在虞舜朝廷任職。《國語・魯語上》也記錄魯大夫展禽說，夏興，棄繼烈山氏爲稷。這些說法皆和所謂帝嚳之子的年代不能銜接；[6] 不過謀父說不窋「及夏之衰」，意義更大。《漢書・古今人表》列棄妃姑人於帝舜之世，棄子不窋於太康之世，蓋以祭公謀父所謂不窋及夏之衰的「夏衰」乃太康失國，非夏桀時事。但譙周已指出「若以不窋親弃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史記索隱》），孔穎達也持類似的看法（《史記正義》）。這是針對〈古今人表〉的排列而發的

---

5. 《尚書・無逸》周公曰：「文王受命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玄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尚書大傳》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此受命有兩種可能，一指繼承王季爲周之邦君，中年繼位，享國五十年；一指受天命稱王，在他的晚年，稱王七年而崩。總之，文王享國長久，據周公說有五十年，《呂氏春秋・制樂》作五十一年，五十蓋舉其成數，應極可信。他享長壽，《禮記・文王世子》言九十七乃終，《孟子・公孫丑上》云百年而崩，故鄭玄謂中年即位也頗合理。

6. 《國語・魯語上》，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韋昭《解》云：「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已來祀也。」展禽與韋昭的話自相矛盾。如果棄早在夏人立國之初就任農官，何以經過數百年夏亡商興才列入祀典？而據《尚書・堯典》棄與禹同在舜廷，一藝百穀，一平水土，亦不待夏興，棄才繼烈山氏主司農事。總之，這些傳說都不可靠，不及蔡墨之說合理。

。清朝「考而後信」的崔述於是倡議「不窋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爲后稷者，不窋非棄子也」（《豐鎬考信錄》卷一），卻又與《史記・夏本紀》傳述的譜牒不符。崔氏之論可能本諸戴震或其他《詩經》學前輩，[7] 雖將「夏衰」定在孔甲，並不能解決譙周提出的疑問。據〈夏本紀〉，大禹至孔甲計十一世十四君，周族既然保有不窋以下十餘世的譜諜，何以不窋以上時間相埒的譜系卻全部失傳？這是崔東壁比較不易解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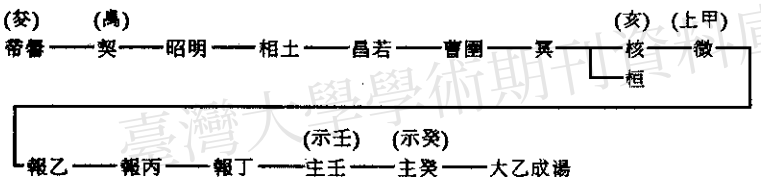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關於周族先公時期的年代前後失據，始祖如搭上帝嚳，裔孫文王與商紂同時，自然世代少而時間長，於是有棄在帝嚳時代，其妃在帝舜時代，而其子晚到夏王太康的矛盾（〈古今人表〉），甚至文王與夏朝帝芒並世的笑話（〈三代世表〉），都坐於棄爲嚳子傳說之故。而今唯有拋開此一糾葛，肯定周室諜記所傳的世系，由近及遠推算，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其他彌縫性的解釋多不可取。[8] 從年代可以明確定位的文王上溯，經十六世便是周族的始原，約屬傳統歷史的夏末，即考古學的二里頭三期。胡謙盈推斷周族淵源年代，先定在商中期末的祖丁（1986），顯然偏晚，後來改在夏末殷初（1987），方爲貼實。所以棄子不窋值夏之衰，應是夏桀之世，而周棄比夏禹和商契至少晚十三世，也可從甲骨卜辭的祀譜和《史記・殷本紀》的先公世系獲得證明。[9]

---

7. 戴震《毛鄭詩考正》云：「不窋已上，代系中隔」（卷三）。主要證據有二，一是宋天聖明道本《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周語〉上）。「先王世后稷」比俗本多一「王」字，戴氏謂先王世代任后稷之官，故棄至不窋非父子相承。證據之二是《史記・劉敬列傳》，婁敬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戴震認爲「十有餘世」指棄至公劉。第二點就《史記》本文言，劉敬概述周族關鍵性的四個時代，十餘世可以說后稷至文王，不必單謂公劉以上。至於第一點，《史記・周本紀》既然明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我們便不好將「子」解作苗裔，而在后稷與不窋之間添加許多世代。後來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及胡承珙《毛詩後箋》卷二十四都沿襲戴震之論，沒有新證據或新發現。當然，如果我們把棄當作純神話人物，斷自公劉，劉敬的說法與史實可能相差不太遠，但這樣做，不窋與鞠的年代也不易安排。

8. 呂思勉《讀史札記》甲帙《先秦》「周先世世系」條云：「古代父子祖孫同蒙一號者甚多」，希冀以同名來解決周族先公年代的矛盾。父子祖孫同名，蓋指族名，如果譜諜，是井然有別的，甲骨卜辭之祀譜與〈殷本紀〉世系最可佐證。

9. 董作賓「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圖」先公世系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下轉次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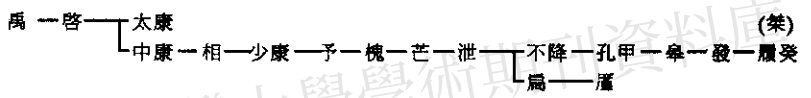
其次關於先公時期的地理。

傳統對於周族起源地的討論比較一致，但到近代，頗生分歧，主要有陝西和山西兩派。實際上原始資料只有《大雅・生民》篇周棄「即有邰室家」一句而已。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鄠縣，班固自注曰：「周后稷所封」，顏師古曰「讀與邰同」。邰、鄠大概是司馬貞說的古今異字（《史記索隱》）。《續漢書・郡國志》扶風郡郿縣有邰亭，《水經注・渭水注》云渭水逕鄠縣故城南，舊邰城也。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鄠鄉在扶風」；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鄠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也」。可見漢唐歷史地理學者多認爲周人最早發源地在今陝西省扶風武功一帶，即關中偏西地區。這是傳統的見解。

近代有些人一反舊說，將周族早期活動地域東移到山西，其中倡論最早、深言博辯者當推錢穆先生六十年前發表的〈周初地理考〉（1931），雖經駁議，直到近年仍然不乏附和之論。誠如齊思和氏所批評的：以前學者考定地望，多徵之於古蹟，或求之於音似。夫世傳古蹟，十九出於後人附會；至於求之於音似，則尤其危險（1946）。錢文方法上最脆弱的地方是以數千年後山西民間傳述的古蹟求證數千年前周族的地望，如果不諧，則運用訓詁學音之近、轉，形之似、訛予以符合。因此，《聞喜縣志》的姜嫄墓和明代李汝寬〈聞喜縣城北門外重修后稷廟記〉的后稷廟，都成爲周起於山西的主要證據，遂以《大雅》的有邰即《左傳》河東的臺駘，今之聞喜。然而陝西說也有類似性質的傳說作佐證。譬如《扶風志》有姜嫄廟，即今姜嫄咀，《雍錄》云武功有后稷祠、姜嫄祠，《武功縣志》也說故鄠城在今漆村東，古邰氏之國。考古學家石璋如先生早年曾在姜嫄咀、漆村發現豐富的彩陶遺存（1948）；徐旭生氏也到關中調查，認爲《水經注・渭水注》的姜氏城，或即今寶雞縣城南門外的姜城堡，與堡西的清姜河可能都是華夏集團姜族的起源地（1960，頁 41-42），離扶風不遠。所以單就今傳古蹟而言，

(承上頁)又據《史記・夏本紀》夏朝世系是



大乙成湯與夏桀同時，分別上推至契和禹，皆十四世，禹、契同時的傳說是比較合理的。棄子不窋值夏末，故推定棄比禹、契晚十三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西說與陝西說難分軒輊。周人謂后稷「即有邰室家」，邰之地望他們應當清楚；而從漢至唐宋，邰都在陝西，未有人懷疑在山西的（參石璋如 1948）。如果我們相信漢唐去古不遠，可能保存一些較早的傳述，陝西說的可信度也許還比較高些。

不過，推考周族早期活動地域，最好也和帝子傳說一樣，有邰的地望不妨存而不論，我們還是從他們「竄於戎狄」說起，主要典據是《大雅・公劉》篇。

公劉是周的第四代先公，《詩經》歌頌他率領族人殖民的情形，涉及的地名有：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

的溥原和京；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于豳斯館，涉渭爲亂，

的豳和渭；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的皇澗、過澗、密和芮。豳、渭一邑名，一水名，向無異議；皇、過，毛《傳》鄭《箋》認爲是澗名，從詩的文理看亦無疑問；其他溥、京、密、芮四地，毛、鄭都不當作專名，溥狀甚廣，京名其大，密者安也，芮表示水之內曲。現在先討論沒有異議的地名。

豳，《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栒邑縣，班固自注曰：「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晉省栒邑入漆縣。豳，開元十三年改爲邠（《舊唐書・地理志一》），和邰、鄠一樣，也是「古今字異」（《史記索隱》）。近世地志謂豳在三水（雍正十三年《陝西通志》，乾隆五十年《三水縣志》），唯不論新平、三水，皆屬唐之邠州，豳的地望當在今涇水中游的邠縣、栒邑一帶。

渭指陝西的渭水，是周族發跡的河川，應該最可肯定；但主張山西說者卻易渭爲河，即黃河。說無佐證，不足取信。《詩》言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毛《傳》云「正絕流曰亂」，朱子《詩集傳》所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公劉既居於涇水中游之豳，順流而下，橫渡渭水，以取材用。《詩》意非常清楚，和橫越黃河無關。

皇澗、過澗，較早說法不詳。《水經注・涇水注》曰：「大陵、小陵水出巡和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陵水注入羅水，再注入泥水，最後入涇水，故所謂皇澗的陵水也是涇水的支流。甯陽故城在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代以下的甯州眞甯縣，朱右曾《詩地理徵》云，縣南有大小陵川，合奢延川南流，經過三水縣北而入涇（卷五皇澗條）。過澗無說，大概亦涇水之一支脈，距豳不會太遠。[10]

「止旅乃密，芮鞫之即」的芮，一本作汭。此章云公劉自豳涉於渭，再率衆人沿著皇澗，逆流上溯過澗，在密停留，臨近汭水，故密、芮也應是地名。《漢書・地理志下》安定郡有陰密縣，班固自注曰：「《詩》密人國」。古有密須之國，在安定陰密縣（《左傳》昭十五杜《注》），而陰密故城在今甘肅靈臺縣西五十里（陳槃 1969，册七，頁 673）。《周禮・職方氏》曰：雍州，其川涇汭。鄭玄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堨之即」。鄭玄箋《詩》，從毛《傳》義，不以爲專名；但他注《周禮》，卻是比較正確的。按《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汧縣，班固注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堨，雍州川也」。趙一清《水經注釋》補芮水亦以「芮鞫之即」的芮在這一帶（卷十九）。芮入涇之處在漢安定郡安定縣，即今甘肅涇川（參譚其驤 1982，册二，頁 34），位於密所在的靈台縣西北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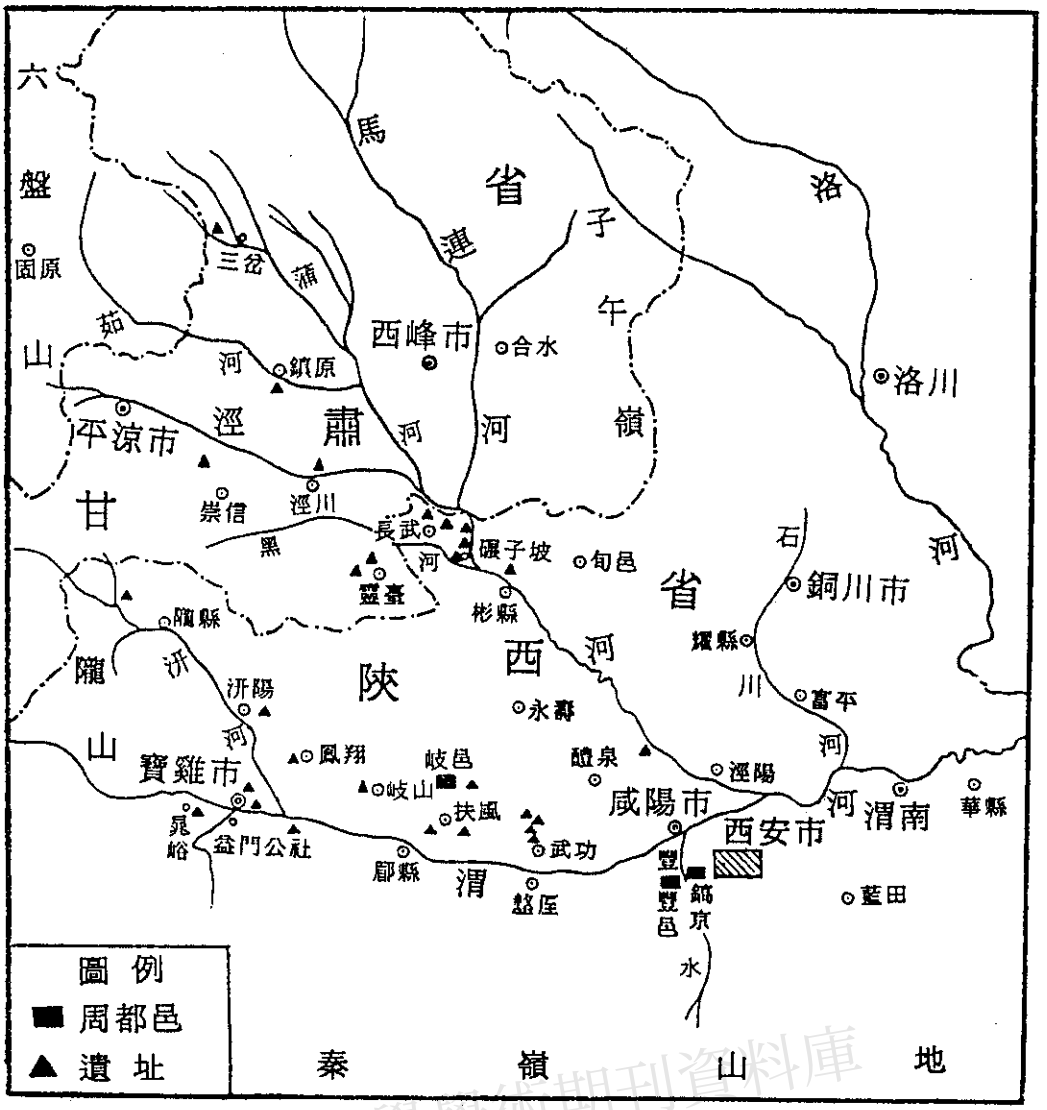
最後關於溥原和京。溥原，王國維以爲即克鼎銘的陳原，在涇水之旁（《觀堂集林》卷十八〈克鐘克鼎跋〉）。京，《詩經》或單言京，或言周京、鎬京，西周銘文有莽京，[11] 皆是都城所在。單稱京者恐怕是省稱，〈公劉〉的京或京師大概指豳地。

---

10. 陳奐《詩毛氏傳疏》疑《水經注》論皇澗曰：「今攷寧州在邠州北百四十三里，眞寧縣又在州東，中隔涇水。酈以陵水有南流之水，即皇澗，恐非是」。又說：「豳居在豳山之西，皇澗在豳居之東，故曰夾」。則皇澗在豳與豳山之間。陳氏引《讀史方輿紀要》云邠州南有豳山，則與朱右曾所推定之方位不同。過澗，陳氏以爲「當在豳居之西北，兩澗皆出豳山，皇澗逕居之東南流入於渭，過澗逕豳居之西邊流，北入於涇」。皇澗獨流入渭之說恐非實。

11. 《大雅》〈大明〉云摯國之女仲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爲王季婦；〈思齊〉曰大任「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京指岐下宗周，〈大明〉所謂「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也，後來直稱「周京」或「京周」（《曹風・下泉》）。〈皇矣〉「依其在京」，〈文王〉殷士「祼將于京」之「京」也都是宗周；但〈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武王之京，鄭《箋》云「謂鎬京也」，〈文王有聲〉明言鎬京。西周銘文有莽京和京，如〈臣辰卣〉（《三代》13・44）、〈臣辰盉〉（《三代》14・12）、〈遹簋〉（《三代》 8・52）、〈靜卣〉（《三代》13・41）、〈靜簋〉（《三代》 6・55）、〈耆簋〉（《三代》6・51）及〈井鼎〉（《三代》 4・12）。周初〈令彝〉，十月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告內外諸服，翌日甲申用牲于京宮（《三代》 6・56）。〈何尊〉云「王初鄀宅于成周，……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文物》1976 年 1 期，頁 62）。此京室即〈令彝〉的京宮，都在成周。成周一旦成爲都邑，便可以和宗周、鎬、莽一樣稱作京。所以〈公劉〉的京可能指周族定居之豳，不是某地之專名。這是從《詩經》與西周銘文歸納出來的初步結論。單就〈公劉〉篇來說，既曰「于京斯依」，又曰「于豳斯館」，京也應當是豳。

另外唐代地理書《括地志》說：「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可能在今日甘肅慶陽縣境內或其附近（胡謙盈 1990 ）。則公劉從涇水上游率領族人南下，卜居於今陝西邠縣和栒邑之間，一度循涇水而南至渭水；亦沿涇水支流而上，到達甘肅靈台和涇川以西。他們的活動地區大概仍以涇水中游爲主，邠縣附近是核心。周族漫長的先公時期可能都在這一帶，直到太王才「去邠，踰梁山，邑於



圖一　先周文化遺址分佈圖

（根據胡謙盈〈試論先周文化及相關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梁惠王下》）。雖然漢代人認爲周族起源於扶風武功，但后稷事蹟神話成分太重，暫時存而不論；關於周族早期活動的地域，按歷史地理考證的結果，應當放在涇水中上游一帶（參圖一）。

以上是根據文獻折衷考訂而得的結論，印證現代的考古資料，對周人興起的問題也許會有新的啓發。

二、考古資料所見周族起源的論辯

關中是我國古老文明發祥地之一，考古學界一度流行的「龍山文化形成期」的理論，還把它當作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單元輻射的理論近年來雖然被多元並行發展所取代，但關中在古代考古學的重要地位依然沒有動搖。

早在西元前五千年或更早，關中地區大小河谷兩岸的台地便散佈很多聚落，開啓聞名於世的仰韶文化。然而這裡的考古文化譜系卻相對地粗略，不論是個別的調查或發掘，關中的考古學斷代仍只限於「前仰韶」、「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西周時期」幾個概念而已。[12] 此雖代表六〇年代中期以前的考古水平，但八〇年前後出版的綜合論述，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或《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仍無新的突破。

即使陝西龍山文化早已分出「廟底溝二期」和「客省莊二期」兩類型，它們的相對年代及先後關係，則直到最近武功縣的趙家來與滸西莊的發掘，才獲得直接的地層證據。趙家來遺址顯示，客省莊二期文化堆積疊壓在廟底溝二期文化之上（《武功發掘報告》頁 87-88），地層關係證明客省莊二期晚於廟底溝二期，此一結論也有碳十四年代佐證。這兩個遺址分別測定六個碳十四標本，滸西莊廟底溝二期文化估定距今約四千七百年至四千四百年左右，趙家來的客省莊二期文化則落在四千三百年至四千年之間。[13] 所以「陝西龍山文化」兩類型年代的先後序列，現在已可以肯定地建立起來（鞏啓明 1989）。

關中考古遺址也顯示，客省莊二期文化之上往往壓著西周文化堆積，這種層

---

12. 調查報告如〈陝西渭水流域調查簡報〉，《考古》1959 年 11 期；〈陝西鳳翔、興平兩縣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60 年 3 期；張彥煌〈漆灃兩河沿岸的古文化遺址〉，《考古》1961 年 11 期；〈陝西涇水上游調查〉，《考古》1962 年 6 期。發掘簡報如〈陝西邠縣下孟村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0 年 1 期；〈陝西邠縣下孟村仰韶文化遺址續掘簡報〉，《考古》1962 年 6 期。

13. 參上引《武功發掘報告》頁 153、156。關於客省莊二期的年代，梅邑木嘴遺址出土標本的年代 1810 ± 90BC，樹輪校正 2155 ± 110 BC，也在趙家來六個數據的範圍內。參看〈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七）〉，《考古》1980 年 4 期，頁 373；〈隨東鐵原常山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1 年 3 期，頁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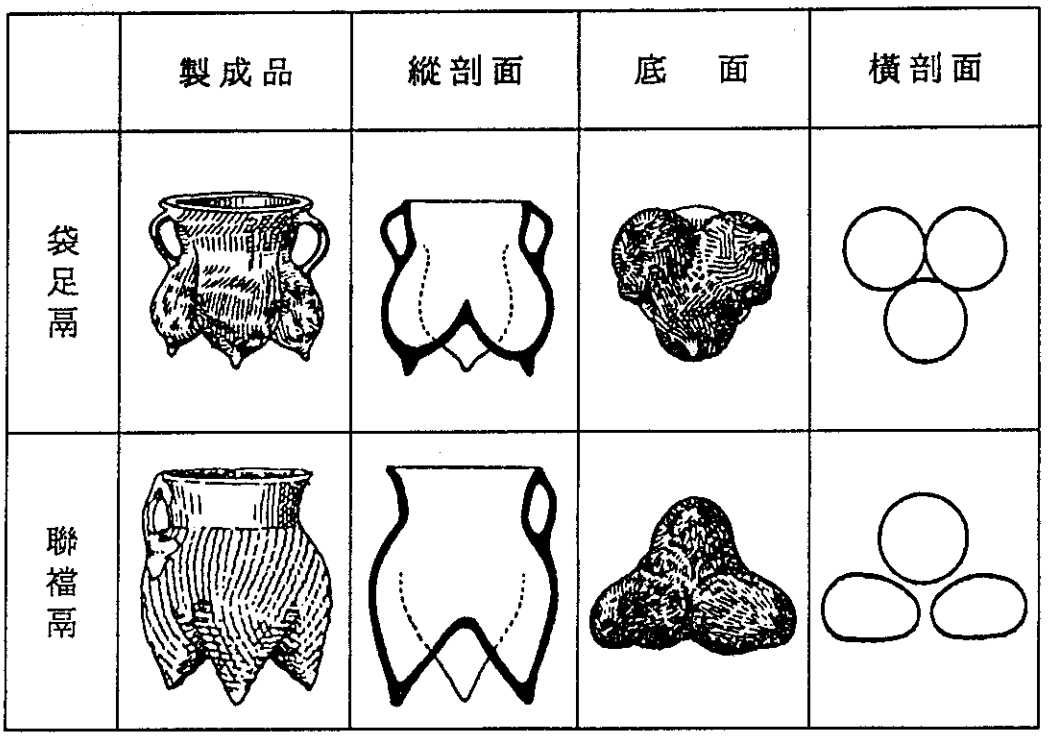
位關係是否說明周文化淵源於客省莊二期，便成爲考古學界長期關注的問題。此中牽涉考古家對於出土器物風格的認定，下文再論；唯就考古和文獻推測的時間來看，客省莊二期的下限，值傳統歷史夏朝之初，猶與上章考訂的周族起源相差四、五百年之久，距離周人爲天下共主幾近千年，可見客省莊二期和周文化之間尚存有相當大的空白。

近年由於全國性考古文化系譜建立起大致的綱領，關中地區新的考古資料不斷充實，考古家提出「先周文化」（或「早周文化」）的概念，以圖苴補空白。所謂先周時期，從竄於戎狄的不窋，居邠的公劉，到遷岐的太王，以及發展壯大的西伯昌，他們活動的地域和勢力範圍皆截然有別；如果時空界限不劃分清楚，對於先周文化的認定是有妨礙的。根據上章考證，周文化淵源的探索工作，時間當以二里頭三期爲上限，地點放在涇水中上游，大部分屬於居邠時期，相對時間延續到殷墟第二期。殷墟第三期太王遷岐，探討周文化的重心轉到周原；殷墟第五期，隨著周人勢力的擴張，周文化已涵蓋整個關中。但即使太王以後的周原，或文王以後的關中，周人與其他部族不斷融合，所以討論「先周文化」，不能只限於姬周部族。

七〇年代末以來，中國考古學界興起探索先周文化淵源的熱烈風氣。考古家主要憑藉是陶器，尤其是民生日用之常又極具特徵的陶鬲，從其類型探索族屬。所謂周鬲一般分爲三類：袋足鬲、聯襠（瘧襠）鬲和仿銅陶鬲。後者年代較晚，與先周文化密切相關者，基本上是前兩類。袋足鬲以三隻袋足拼接，上加領部而成，容積主體在足；聯襠鬲則以一圓筒作主幹，分切三等分，捏成三足，容積主體在腹（參圖二）。考古家根據陶鬲論先周族屬，主要分爲兩派，一派主張姬周文化的特徵是高領袋足鬲，一派主張是聯襠鬲。高領袋足鬲的大本營在甘肅和青海，向東延伸到隴東的慶陽和陝西的寶雞與涇水中游；聯襠鬲主要分佈於周原以東，如澧西、武功鄭家坡和扶風北呂。大體上這兩種類型陶鬲的分佈範圍可以周原分界，中間有部分重疊交叉地帶。主張聯襠鬲是姬周文化者，多以澧西作基點，因爲這裡是文王的都邑，而出土之鬲以聯襠爲主，後來且成爲西周陶鬲的主流；相對的，主張高領袋足鬲者則強調，周人遷岐之前長期活動地區是涇水中上游，而這一帶多發現袋足鬲，所以袋足鬲應是探索周文化根源的重要依據。

由於對姬周陶鬲認定不同，先周時期姬周文化（或族屬）的起源遂產生相當分歧的意見。有主張起源於客省莊二期者，如徐錫台（1979a）、尹盛平（1984、1990）；有主張來自陝東、晉西的光社文化者，如鄒衡（1979、1980、1988）；有主張大抵淵源於寺洼文化者，如胡謙盈（1986a、b，1987、《考古學集

刊》6）；也有人推源於陝甘青地區的辛店文化，如盧連成（1985、1988），後面這兩種意見在文化類型上比較接近。凡此諸說，有相通也有抵觸，提供更寬廣的角度以認識先周歷史，但若眞要追究周族的起源，仍存有不少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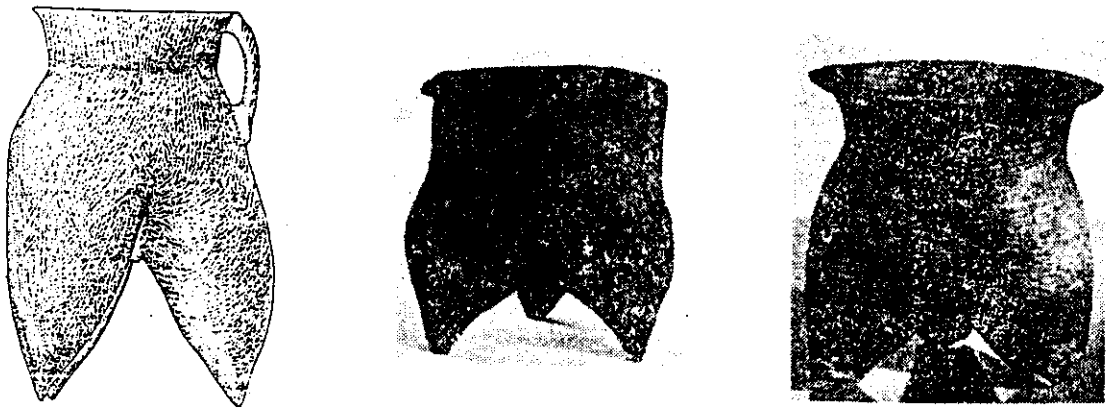


圖二　袋足鬲與聯襠鬲的形制

（根據蘇秉琦〈瓦鬲的研究〉）

客省莊二期說主要理由有三，一是地層疊壓。以往的知識，關中古代遺址客省莊二期之上往往疊壓西周文化，故易造成二者傳承的錯覺。其實直接疊壓的上下層文化未必直接啣接，尤其近年陝西地區也零星地發現二里頭文化，如華縣南沙村、元君廟、華陰橫陣村，晚於客省莊二期，早於商代（鞏啓明1989），足見客省莊二期和西周仍相當懸隔，不好輕易斷定客省莊二期與周人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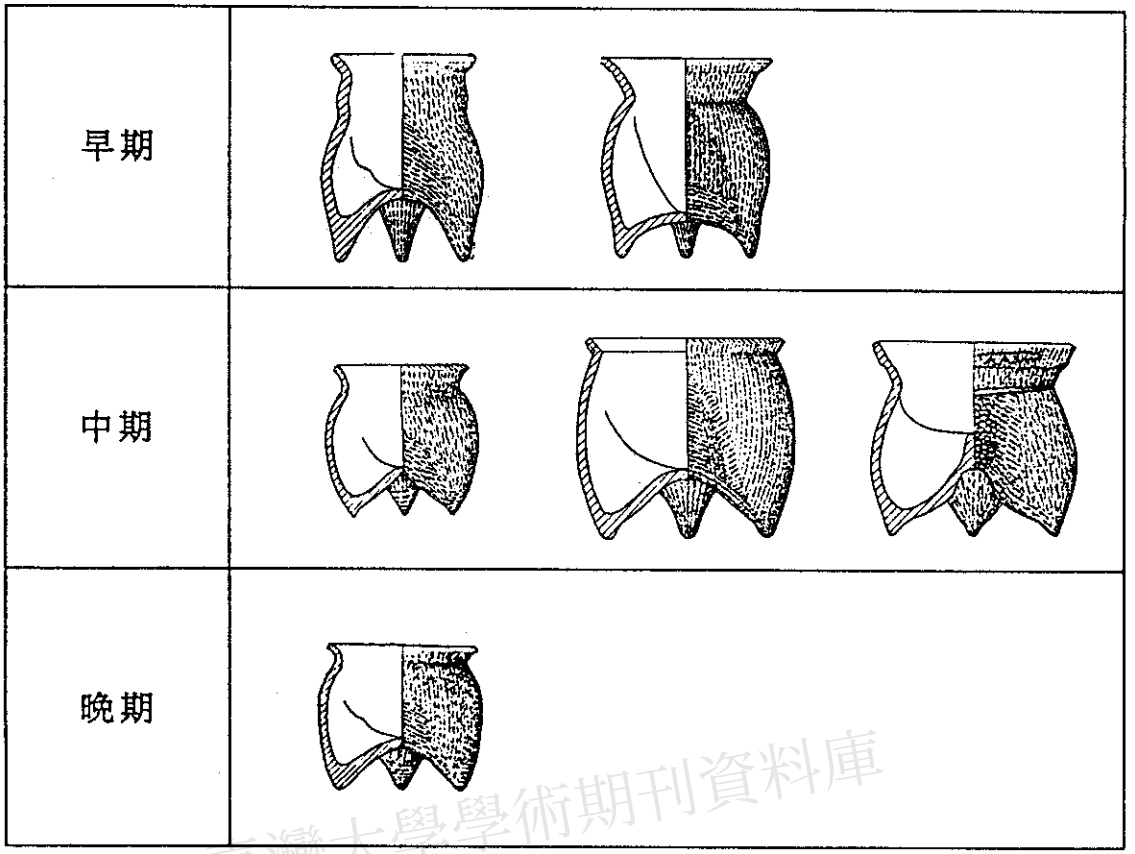
二是器物類型。徐錫台先生認爲岐山賀家村和邠縣下孟村早周（先周）遺址發現的乳形空心袋足分襠鬲，上附把手或附加鋸齒文之泥條雙橫耳作風，是由客省莊二期的帶把手高足鬲演變來（參圖三）。尹盛平氏雖然改採聯襠鬲作爲先周（姬周）的典型陶鬲（參圖四），由於武功鄭家坡先周遺址出土的陶鬲，形制與



客省莊二期陶鬲　　賀家村 I 式鬲　　賀家村 IV 式鬲

圖三　客省莊二期與賀家村先周之陶鬲

（根據徐錫台〈早周文化的特點及其淵源的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四　武功鄭家坡陶鬲

（據《文物》1984:7）

客省莊二期大體相同，[14] 故亦屬於客省莊二期論。就器物風格而言，客省莊二期的特色是單把聯襠罐形鬲，固與袋足鬲不屬一個譜系（張忠培 1980），但聯襠鬲是否更受商鬲的影響呢？近年逐漸明白關中的商文化（下詳），光憑聯襠鬲要論證先周與客省莊二期的關係，恐怕也是靠不住的。

三是文化斷代。主張鄭家坡遺址屬於先周文化者，或可利用鄭家坡遺址報告者的斷代，拉近先周文化和客省莊二期的距離。原報告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可以早到二里頭文化，晚期至二里岡下層，中期接近殷墟四期，晚期約值文王作豐之時。於是先周文化提早數百年，與客省莊二期之間的空白乃大大縮小。不過，有人指出，鄭家坡發掘簡報的資料整理太粗疏，分期頗多錯亂，而且估計得過早。謹慎的斷代認爲，早期不超過武丁前段，中期約武乙、文丁、帝乙；晚期從文王到成王（盧連成 1988），有的定得更晚，只相當於西周早期，上限到文王而已（張長壽、梁星彭 1989）。所以提早鄭家坡年代以銜接客省莊二期的企圖恐難取信於人。

第二種說法：姬周起於光社文化。上章說過，歷史學者考訂文獻，曾有周族起於山西之說，如果考古資料也能得出類似的結論，二者合流，其說服力必定倍加可信。鄒衡先生對此問題不但較早引考古以入歷史，也與近代歷史學的新說符應，故特別引人注目，而爲一些史學著作所引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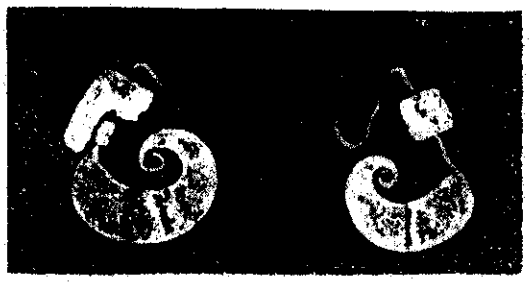
鄒衡先生以錐足與平足兩種聯襠鬲說明先周文化和光社文化的關係。山西太原光社出土的錐足聯襠鬲，細頸，寬下腰（解希恭 1962）；平足聯襠鬲，光社遺址只出土殘足，無法知其全形。鄒氏說，光社文化中期的聯襠鬲褐色細繩紋的特徵，與先周文化寶雞鬥雞臺的聯襠鬲相同，前者比後者早，故證明它們的承襲關係。

然而，陶鬲可資討論的證據不多，鄒衡的論證毋寧更倚賴於青銅器，他舉𠂤、天、𠂤（戠）等銅器銘文作例證。這些都是商代習見的族徽，其銅器分佈甚廣，關中出土者一般多屬於西周早期，但在山西北部或黃河對岸的陝北則可早到殷墟時期。鄒氏認爲他們是周部族中的個別氏族，由於山西與關中出土銅器年代明顯有先後之異，遂成爲周族由晉遷陝說的根據。不過單從這些族徽並無法確認他

14. 尹盛平說，岐山雙庵發現十件客省莊二期的陶鬲，與鄭家坡所出A型高領聯襠鬲形制大體相同；鄭家坡的B型鬲與客省莊H213的陶鬲也有較多共同因素。雙庵遺址見〈陝西鳳翔、興平兩縣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60年3期；鄭家坡見〈陝西武功鄭家坡先周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7期。客省莊H213見《灃西發掘報告》頁56，文物出版社，1963。

們是否爲周人，何況周人克殷之後，很多東方氏族西徙，卜居關中（杜正勝 1979、1982），同一族徽見於山西者早，見於關中者晚，是不足爲奇的。

至於說几是光社文化一種銅弓形器的表記，商周銅器族徽若可如此比附，將沒有不能成立的結論。弓形器，弓頂作方首，兩端各穿一小孔，弓邊起方稜，器或銅質或金質，往往與金珥形器並出（參呂智榮 1987 附表），如石樓桃花庄、後藍家溝，永和縣下辛角村。金珥，形似耳環，尾爲細絲柄，上各穿以綠色珠。弓形器陝西尚未發現，金珥見於陝北清澗李家崖和寺塢，與山西的石樓正隔河相望，當屬於同一部族的文化區（參圖五）。目前所知最西達到涇水東邊的淳化（姚生民 1986），1982 年該縣黑豆嘴塬 CHXM3 出土金珥四件，按同出饕餮文壺推斷，時間晚到殷末周初，並不適合作爲討論周族淵源的證據。總之，弓形器和金珥與鈴首劍、蛇首匕、獸頭刀一樣，皆是陝晉北部沿黃河兩岸最具地方色彩的器物，後者是一般通稱的北方系青銅器（烏恩 1984，林澐 1987，陳芳妹 1991），絕非姬周文明的根源。



石樓後蘭家溝耳環



石樓後蘭家溝弓形器



銘文（《三代》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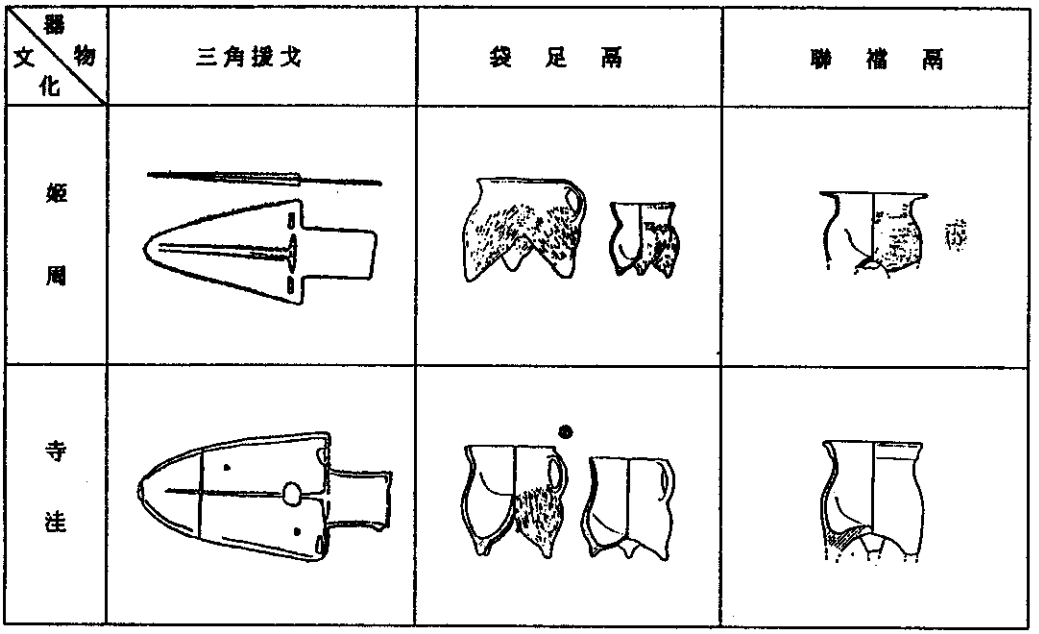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五　弓形器與耳環

（根據鄭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頁 338）

關於姬周文化起源的第三種理論，以胡謙盈先生的寺洼說爲代表，他的證據分武器和陶器兩方面（參圖六），比較標本是甘肅莊浪徐家碾寺洼文化（《考古》1982：6）和陝西岐山賀家村（徐錫台 1980，《考古》1976：1）及澧西先周文化（《澧西發掘報告》）的相似器物。

武器以三角援戈最具特色，援部寬短，呈三角形，上下二穿孔，中有脊稜突起，無胡，周原地區除賀家村外，斷爲太王至文王的扶風北呂第一期（《文物》1984：7）和先周晚期的鳳翔西村第二期（韓偉、吳鎭烽 1982）的墓葬皆有所發現。



圖六　姬周文化與寺洼文化

（根據胡謙盈〈姬周族屬及其文化探源〉）

現知考古出土三角援戈主要有河南的鄭州、安陽，陝西的關中、漢中，和四川成都平原北部（參陳芳妹 1991）。川西三角援戈形制頗爲複雜，時間在西周晚期以後（霍巍、黃偉 1989，馮漢驥 1980），與本文無關，茲不具論。關中寶雞竹園溝強國墓地出土的三角援戈，最早只到西周武成時代（盧連成、胡智生 1988，頁 262-269），用作探討周族及其文化起源的標本仍然嫌晚。如胡謙盈所舉證之例，目前所知資料當數漢中城固（唐金祐 1980）最早，按同出禮器，城固的材料約屬於武丁時期，故推測漢中是這種戈的起源地（李伯謙 1983，盧連成 1983）。另外藍田懷眞坊的商代遺址（樊維岳 1980）也有所發現，同出禮器也具備商

代早期的特點。反觀徐家碾寺洼文化，即便早於西周初期，出土三角援戈的墓葬並無可能提前到武丁或二里岡期。胡謙盈排比姬周與寺洼文化的武器，以最突出的三角援戈而言，寺洼文化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早的，因此，從異形兵器來看，這兩種文化的承襲關係無法建立。

不過，姬周文化源出於寺洼文化之說的基礎還是在陶器，胡謙盈先生認爲先周兩大類型的陶鬲——袋足與聯襠，都可以從寺洼文化找到根源（1986、《考古學集刊》6），而與姬周最有關連的是高領乳狀袋足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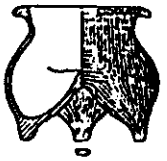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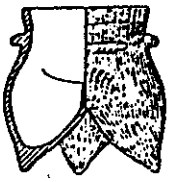
袋足鬲，石璋如先生早年在邠縣調查曾發現過，後來也偶有所見，[15] 尤其1980年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距邠縣不遠的長武碾子坡發掘先周墓葬（《考古學集刊》6），典型陶器便是高領袋足鬲。發掘者胡謙盈將長武碾子坡、邠縣下孟村和長安客省庄等處遺址聯繫起來，建構先周文化三期發展的序列（參圖七），第一期早於太王，約值殷墟二期（以殷墟四期說爲準），第二期屬於太王、王季，和殷墟三期相當，第三期文王至克殷之前，等於殷墟四期（1986）。這種看法和傳統文獻所說，周人自不窋之後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居豳即戎，太王避戎狄而徙於岐下比較吻合，胡氏遂以袋足鬲作爲姬周文化的重要指標，追溯它的源頭到寺洼文化。

盧連成先生則認爲寺洼文化許多因素（如單耳罐、束腰圈足簋）雖與先周文化相通，但其主要類型——「安國類型」的陶器則與先周文化的內涵存有較大差異，他毋寧將先周文化導引到甘肅姬家川的辛店文化（參圖八），以銜接寶雞地區的乳狀袋足鬲（1985、1986）。而胡氏所建構的先周文化三期發展系統，陶鬲與其他文化現象也有不協調的地方。乳狀袋足鬲主要發源和分布地是甘青，有人逕稱作「戎式鬲」。中國早期土洞墓主要分布中心也在甘青（謝端琚1987），與乳狀袋足鬲同被視爲西戎、羌、胡的文化特徵（俞偉超1985，頁188）。袋足鬲與土洞墓相關係數甚高，扶風劉家先周墓地（《文物》1984：7）猶可證明。但碾子坡第一期墓葬，七十多座皆豎穴土坑墓，到第二期才出現土洞墓（胡謙盈1986），把碾子坡的遺存當作先周時期姬周族文化的標本，雖然年代、地理兩方面符合傳統文獻，考古資料仍有不易解釋的地方。

誠如上言，中國考古學界討論先周文化，一般預設袋足鬲和聯襠鬲代表兩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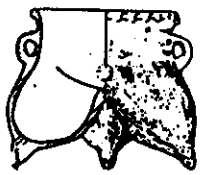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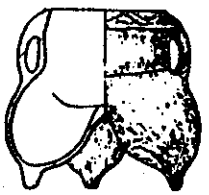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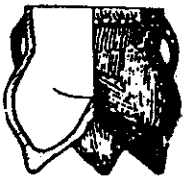
15. 石璋如〈關中考古調查報告〉發表兩件邠縣土陵村的袋足鬲（圖版拾貳，2），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1956。〈陝西邠縣下孟村遺址發掘簡報〉發表一件鬲足是袋足（圖一，8），見《考古》1960年1期。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A型袋足鬲	B型袋足鬲	C型袋足鬲	瘧 襠 鬲
一期				
二期				
三期				

圖七　胡謙盈論先周陶鬲

（根據胡氏〈試談先周文化及其相關問題〉）

辛店文化類型	石嘴頭晁峪類型	劉家類型	門雞台類型
			

圖八　辛店文化譜系陶鬲

（根據盧連成〈扶風劉家先周墓地剖析〉）

部族的文化，鄒衡先生首先提出聯襠鬲代表周族，袋足鬲代表姜族，二者結合而構成先周文化（ 1980 ）。盧連成並不贊成單以一種陶鬲的演變軌跡勾勒先周文化

，主張從多種層次作網絡性的探索（ 1988 ）。就歷史文獻而言，姬周之先公長期住在涇水中上游，遷徙到岐下之後，「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大雅・緜》），太王娶太姜，姬姜二族結成聯盟。先公時期姬姜二姓的關係，文獻闕載，今難詳考，但傳說后稷之母姜嫄，姬姜之結合恐不會晚到遷於岐下才開始。考古證據也有所啓示。今日考古所謂「先周文化」的分布地域，以陝西的寶雞地區和隴東的平涼慶陽地區最密集，在文化譜系上，寶雞地區可以上溯到辛店文化，平涼、慶陽則屬寺洼文化，二者又具有很多共通性，相對於東方的商文化，可以算作袋足鬲的大類。這兩支考古學文化雖然密切，反映到歷史文獻上，辛店文化可能偏於姜氏族，寺洼文化偏於周氏族，所以探討先周時期姬周氏族文化的淵源，寺洼說雖存在一些問題，恐怕仍應在此文化地區內尋覓。

三、關中商文化與周族在關中的發展

袋足鬲和聯襠鬲這兩種文化或部族間的關係，先周的實際情形當遠比今日所能想像者複雜，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向來忽略的關中商文化。近年扶風益家堡發現三層文化，有清楚的疊壓關係，下層商文化，年代從商前期至祖甲時代；中層高領袋足鬲，約等於殷墟後期；下層聯襠、分襠（袋足）鬲共存（鄒衡 1988 ）。這個遺址文化層位可能揭示先周時期姬、姜與商人（或受商文化影響的部族）的鬥爭和融合，須從太王遷岐說起才容易明白。

前文考證周人自公劉以下，大概十五世之久都居住在涇水中游的邠，到太王時遭受薰育戎狄之攻擊，求和不能，於是去邠，踰梁山，而止於岐下周原（《孟子・梁惠王下》、《史記・周本紀》）。他們遷徙的路線，《大雅・緜》篇描述得頗爲詳細，曰：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土、沮、漆等古代地名向來考訂不盡一致，這不僅關係周人遷移的路線，對於他們在關中發展的認識影響尤巨，不能不略加分疏。

首先是梁山的所在。陝西有兩處梁山，一在東部韓城、郃陽縣境，一在西部，武功、乾縣和麟游，古史傳說太王所踰之梁山是指後者。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鄭玄云：「岐山在梁山西南」，而斷定梁山橫長，東當夏陽，西北臨河，西當岐山東北（〈周本紀〉），呈西北東南走向。清代閻若璩更精確地指出在今乾縣西北五里，界乎邠岐之間（《四書釋地續》梁山條）。蓋太王由邠至岐西南行，取徑梁山，不可能反而往東北走到黃河邊也。此原則一旦確立，〈緜〉篇所述的地理方位才能免於糾紛。

自土沮漆的「土」，王引之云：「當從《齊詩》讀爲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游、武功二縣」。按《水經注・渭水注》有杜水，云「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注於渭。依地勢推度，太王踰過梁山，西南方向阻於岐山山脈，遂沿杜水南下，但也沒有直抵渭濱，而在杜陽川與漆水合流之處就改走漆水，溯流西上，抵達周原，故〈緜〉篇說：「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此又涉及漆沮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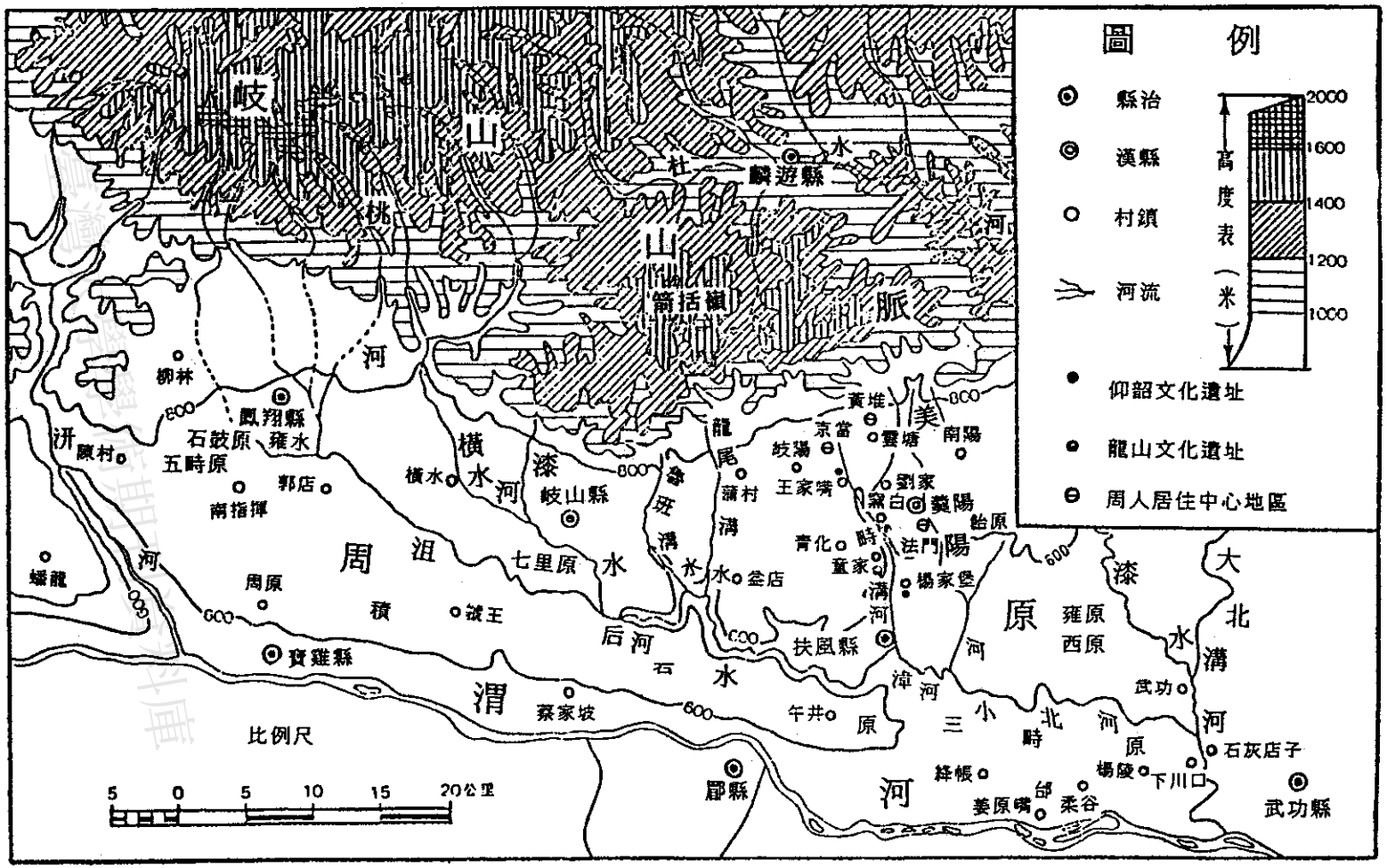
《史記・周本紀》「度漆沮」，[16]《集解》引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漆沮是發源於岐山的河流。《水經注・渭水注》曰：「漆渠水南流，大槃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二川并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謂之小橫水」。小橫水源出岐山山脈，「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又歷周原下」。這條河流東南流就和北來的杜水會合。故太王離開杜水，取道漆水，西上，終必達於岐下的周原（參圖九）。

至於沮，《水經》有沮水，據《漢書・地理志》云，出自北地直路縣，東入于洛。這是陝西東部的河川，北洛水的一條支流。由於孔安國解釋《尚書・禹貢》「漆沮既從」，合漆沮爲一，而認定即是北洛水，學者引以說《詩》，徒增混淆（參胡渭《禹貢錐指》卷十一）。徐廣所指杜陽岐山沮漆之「沮」，文獻罕見，王引之遂將「自土沮漆」的「沮」讀作「徂」，謂太王自杜水往漆水，別無名作沮水的河流。不過《周頌・潛》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毛《傳》云二水名。[17] 史念海先生結合古今地名，斷定周人的杜水、《水經注》的杜陽川，即現在的漆水河；周人漆水或《水經注》的小橫水就是現在的橫水河，而沮水即是現在的漳河（1981，頁 218）。因爲橫水河與漳河合流東注漆沮，故常連言。

太王遷岐和周族的起源一樣，也有偏於東方的說法，陝東既有梁山，也有漆沮水，有人遂將〈緜〉篇的沮漆當作富平石川河，屬於北洛水的一支，而「來朝走馬」的「朝」也擺到陝東朝邑去（錢穆 1931）。這些地名考釋，個別來看雖可兩存，但合併而言，陝東之說便難免支離。大方向上，太王越過梁山，沿杜水而南，再折沮漆二水西溯，抵達岐山之南的周原。太王何以未往涇水以東發展，甚至到武功縣境並未下抵渭川，再向東行，今日的考古知識可以略作解釋。

16. 〈周本紀〉云：「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渡沮於前，踰梁山於後，次序顛倒，恐係一時失誤。

17. 近人辛樹幟亦因沮水文獻無聞，而將「沮漆」讀爲漆水之沮，即下濕地。漆水有沮，據他說是雍水（今之漳水）造成的（《禹貢新解》頁 144）。他雖然點出漳水，但把自土沮漆的「沮」講成下濕沼澤，恐怕與《周頌・潛》歌頌「猗與」深「潛」的河川不符合，所以我們以爲仍以毛《傳》爲宜。



圖九　周原地區略圖

（根據史念海《河山集》二集，頁216）

誠如本文第一章所論，周人克殷以前的先公先王時期大部分屬於商代，幾十年來中原殷商考古文化，以安陽和鄭州爲中心而建立的系列逐漸細密時，關中地區卻相對地空白。近年關中的商代考古資料日益充實，除散見的青銅禮器外，也有比較集中的遺址，填補以往認識的空白（參圖一〇）。

陝西所出商代銅器的分期和分區研究（李峰 1986，宋新潮 1989），現在可以早到商代中期的二里岡上層，大多數屬於殷墟時期。按古本《竹書紀年》，太王之子季歷活躍於商王武乙晚期，而後爲武乙之子文丁所殺。武乙在位至少三十五年，則太王遷岐大概在武乙早期或康丁晚期，約值甲骨卜辭第三、四期之間（以殷墟五期說爲準）或殷墟銅器中期。太王遷岐以前的商式銅器或遺址，在陝西發現已不止一處，現在分批討論如下。

1. 銅川三里洞，1965 年出土夔文銅鼎（盧建國 1982）。

2. 藍田懷眞坊，1973 年出土有七件青銅器和一件石磬（樊維岳、吳鎭烽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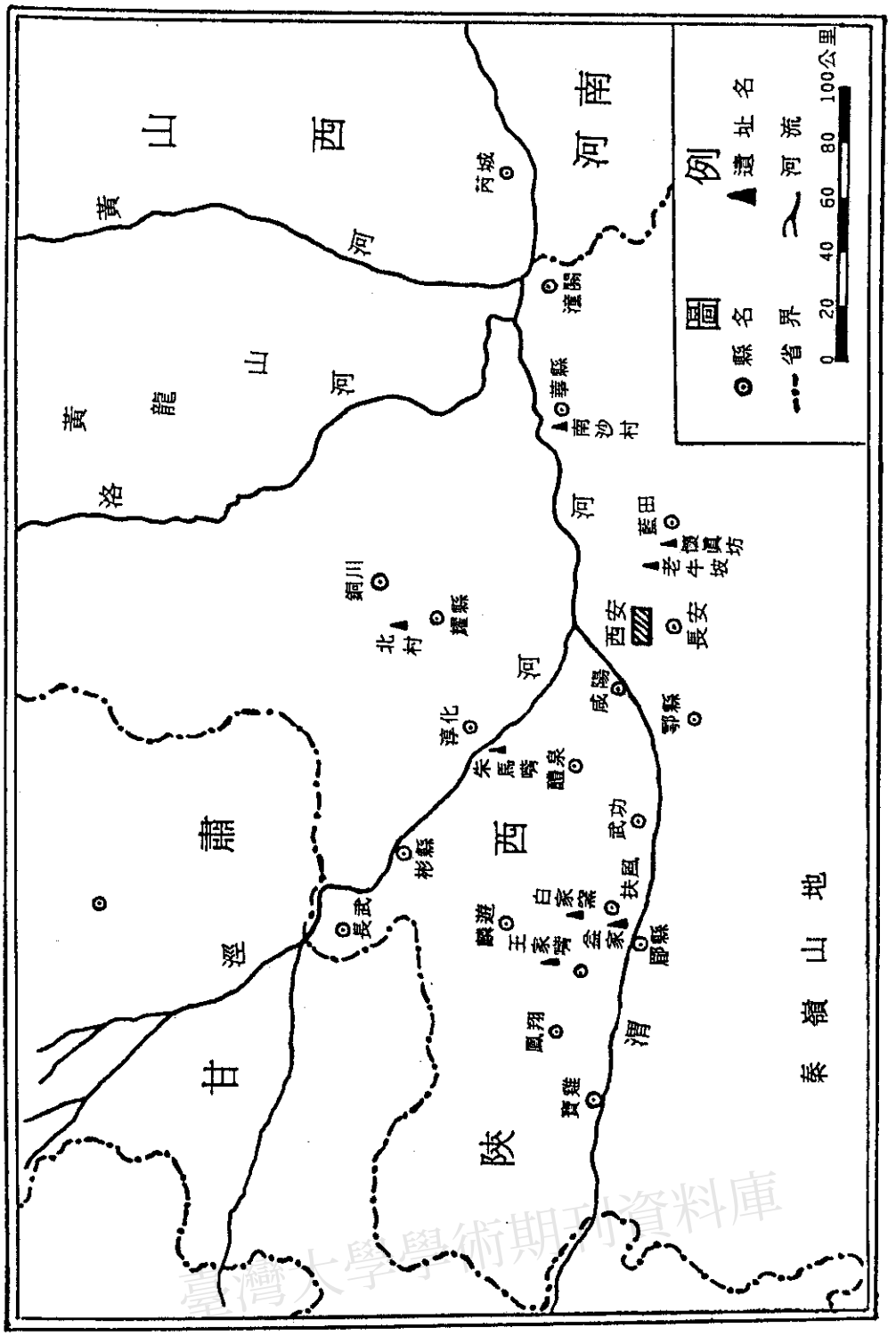
3. 岐山京當，1972 年同坑共出五件銅器，戈、爵、斝、觚與鬲（王永光 1977）。

三里洞夔文銅鼎出土情況報告無說，懷眞坊銅器出於商代遺址，京當可能是窖穴，從銅器的風格論，這三處遺址早到二里岡上層，最晚不遲於殷墟早期。[18] 另外 1973 年扶風美陽出土禮器及工具，其鬲亦見於鄭州白家庄墓 3，即二里岡上層，鼎約值殷墟早期，簋卣屬於殷墟晚期（羅西章 1978）。這是一處殷晚期墓，但隨葬一些古董。

從二里岡上層到殷墟早期，目前所知最有名的遺址莫過於

4. 西安老牛坡，1972 年老牛坡出土銅器十三件、陶器二件。銅器有饕餮文斝、雲雷文爵、弦文爵、戈、鉞、削、二穿刀、鏃、錛、斧、鑼；陶器有罐及鬲足，應是一座墓葬（保全 1981）。1986 年更在此遺址內發現一片古代墓地，清理商代墓葬 38 座，商代馬坑及車馬坑各 1 座。墓葬按面積、葬具、殉人區別成中型墓與小型墓兩類，共出青銅禮器 6 件，包括鼎

18. 銅川三里洞的夔文鼎深圓腹，尖錐足中空，單線無地夔文，與河南鄭州白家庄M 3（《文物參考資料》1955：10）、湖北黃陂樓子灣M 3（《文物》1976：1）所出之鼎相同，屬於二里岡上層，1962 年發現的饕餮文鼎胎體較薄，雙耳外側呈凹槽，時代也較早。懷眞坊銅鼎器壁較薄，文飾簡模，兩耳與三足不對應，與殷墟第一期的弦文鼎相似，刀的形制亦見於盤龍城III式刀，它們製造的年代大約相近，即二里岡上層。京當出土銅器胎質較薄，皆單層花文。爵近似鄭州白家庄M 3 的爵，斝與西安老牛坡M 44（《文物》1988：6）及小屯M 231 所出者相似，觚、近於小屯M 333 之觚，時間大約都從二里岡二層至殷墟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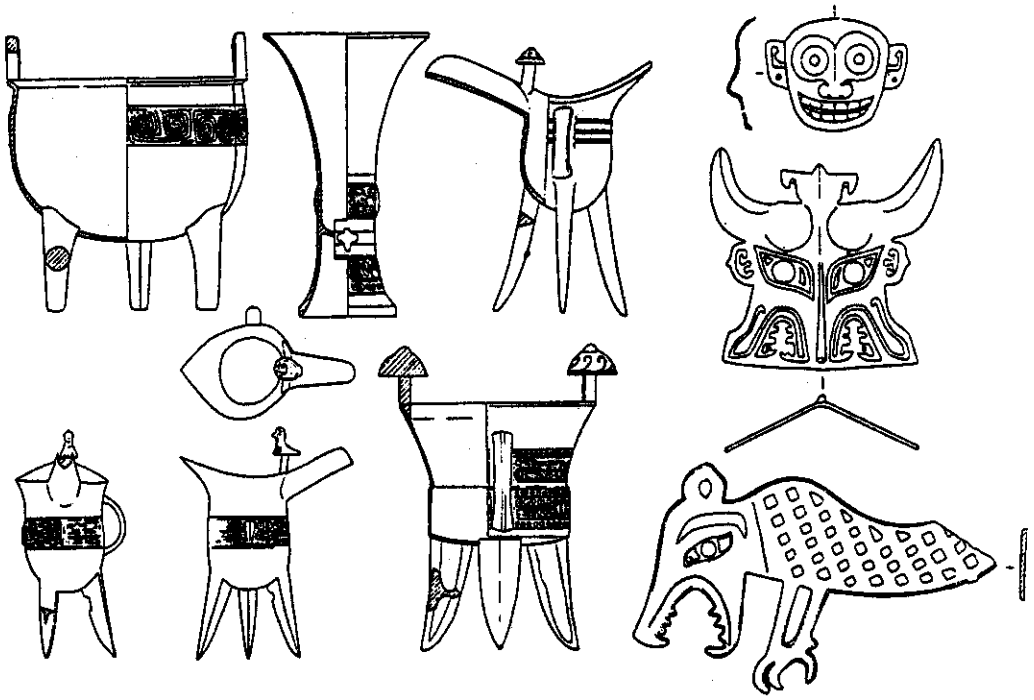


圖一〇 關中地區商文化遺址分布圖

（根據徐天進〈試論關中地區的商文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觚、爵、斝，武器有戈、鉞、鏃，工具有斧、鑿、錐，還有人面形飾、牛頭形飾、小獸面飾、鳥獸形飾（疑是虎形飾），以及車馬飾等（參圖一一）。陶器主要是鬲，罐次之，另外亦出少數玉石器（《文物》1988：6）。



圖一一　老牛坡出土青銅器

（根據《文物》1988:6）

老牛坡1972年所出青銅容器多平底薄壁，三足尖錐高細，花文粗疏，無地文，具有二里岡上層或殷墟早期的特徵；斧戈鏃鉞形制見於盤龍城，陶罐的造型文飾以及鬲足也與二里岡同類器物相似，故其年代大概在二里岡上層到殷墟早期。1986年發掘的M 10:1 鼎平折沿、方唇、微鼓腹、圜底、三抱足較短，上粗下細，腹飾一帶雷文，范線明顯，M 33:4 爵流窄長尾較短，雙菌狀立柱，圜底，實心錐尖足，分別與武官村59 M 1之鼎和59 M 1:6之爵相似。武官村該墓年代，據隨葬之銅器和陶器判斷，應早于武丁，下限到武丁時期（《考古》1979：3）。老牛坡M 44出土銅觚、爵與斝，報告認爲其形制與安陽三家庄80 M 3所出有許多共同點，如斝都是束腰尊式，觚口與圈足喇叭狀，體較粗矮，器壁較薄。但M 44的觚圈足上有兩個相對的十字鏤孔，爵作鳥形單立柱，都帶有較早的特徵。三家庄M 3晚

于二里岡上層，早于武官村 59 M 1（楊錫璋 1983），所以老牛坡M 44 當介於二里岡上層至殷墟早期之間，也就是說，這墓地的上限不會晚於此時。

其他地區約比老牛坡M 44 稍晚、而可能與M 10 同時者有

5.渭南姜河村 1984 年出土青銅器 17 件，除鼎、爵各 1 件外，都是兵器和工具，顯然是一處墓葬（左忠誠 1987）。

鼎腹微鼓，三足錐形外撇，頸飾凸弦文；爵雙菌立柱，長流短尾，錐足外撇，腹飾饕餮文。這些青銅禮器形制基本與安陽三家庄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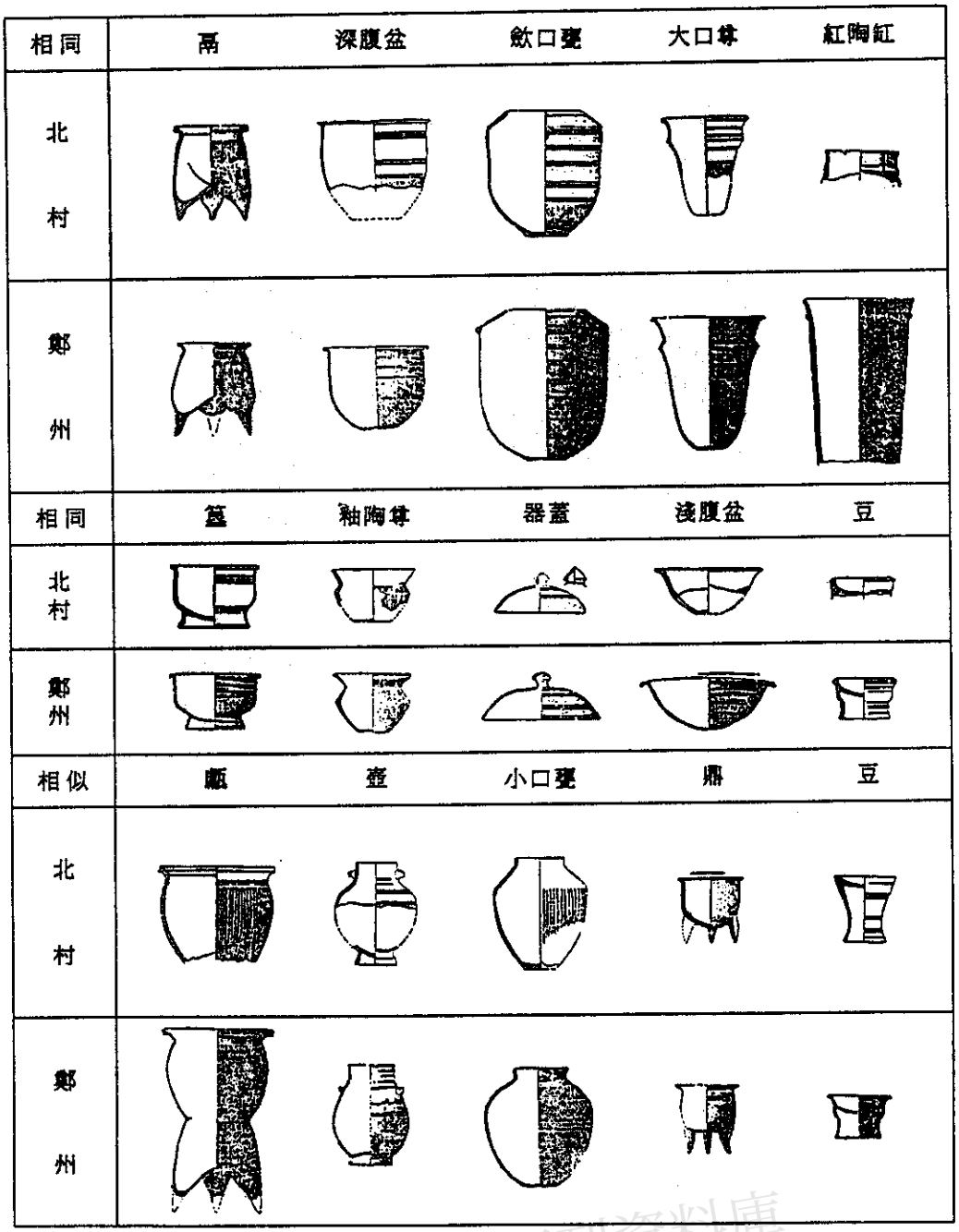
老牛坡墓地無打破疊壓關係，少完整墓葬，出土器物不多，尚難分期；但由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觀察，報告者認爲它們的年代大抵相近。這裡出土的馬車結構和形制，與殷墟所出者基本相同（劉士莪 1988），可能有不少墓葬屬於典型殷墟時期，包括殷墟早期和殷墟中期，如M 41 出土的人面形飾和牛頭形飾（各 2 件），亦見於典型殷墟風格的城固蘇村（唐金裕等 1980）。

關中的典型殷墟銅器群還見於

6.武功浄泥村，出土後流散，先後共徵集到禮器 8 件：聿貝甲罍、饕餮文鼎、蟬文鼎（甲、乙）、子荷貝鬲、覃鬲、弦文甗，及兵車器 21 件（段紹嘉 1963）。

蟬紋鼎口夔文，腹圍垂葉蟬文；子荷貝鬲與覃鬲口足皆飾夔文，腹圍乳釘，襯以菱格中雷文。這些鼎鬲的形制與花文，都可在婦好墓找到類似的標本（《殷墟婦好墓》頁 42，圖版 8、9；頁 49-50，圖版 16），其他各器也都表現典型殷墟的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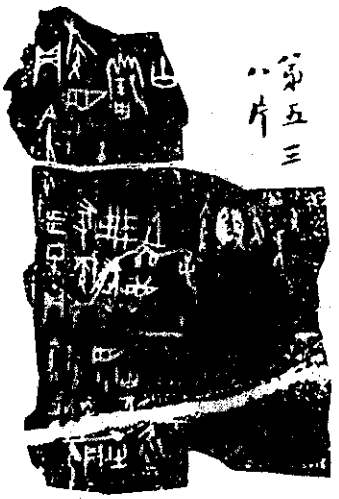
總之，以上六處遺址的年代都在太王遷岐以前，屬於這一時段的零星出土尚有多件，如陝北的清澗張家坬（《陝西》(一)，頁 61-66）、解家溝（《考古學集刊》2〔1982〕，頁 41-43）與漢中的城固蘇村，因爲和本文主旨無涉，可以不論。這六處遺址，大部分在涇渭合流以東。陝西東部的商代早期遺址，涇水以東的耀縣北村是今日所知一個比較重要地點（盧建國、陳昶 1984，徐天進 1990），出土陶器分成三期，第一期相當於二里岡下層，第二期二里岡上層或稍晚（參圖一二），第三期從殷墟早期至典型殷墟。有人以北村作標竿，將關中十幾處商文化遺址納入適當的期別，發現北村一期及二期偏早的遺存多分布在關中東部，二期偏晚及三期才達到周原，前後階段大抵可以西安爲界（徐天進 1990）。以上的考古資料反映商王朝從二里岡期下層開始，對陝西已有所經營，涇水以東地區即使不是商人有效控制區，至少也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太王踰梁山沿漆水河南下，走到武功附近，不東南順流入渭，折而西走岐下，可能是受到東方阻力的



圖一二 北村和鄭州部分陶器比較圖

（根據徐天進〈試論關中地區的商文化〉）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卜辭通纂》538



《殷虛書契前編》7.31.4

圖一三　撲周卜辭

緣故吧。而自殷墟期之後，西安以西才發現商文化，這個有趣的現象正好透露商「周」關係的經緯。

論周族和商王朝的關係，歷來學者經常引用甲骨卜辭作證據，其實早期卜辭的「周」和太王這支周人是不同的。卜辭的「周」與商王朝常有戰事（參圖一三），主要資料如

（1）己卯卜，殼貞，令多子族比犬侯撲周，古王事，五月（《續》5.2.2）。

（2）貞，令多子族眾犬侯撲周，古王〔事〕（《通》538）。

（3）殼貞，令旂比侯撲周（《前》7.31.4）。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4）貞，惠熹令比撲周（《後》下.37.4）。

（5）丙辰卜，宁貞，王惠周方正（《丙》444）。

糸、宁都是一期的貞人，撲，伐也；正，即征。有的卜辭作「𠬜周」「𢦏周」「周禽」（島邦男《綜類》頁299），𠬜即敦，𢦏即災，禽即擒，皆征伐之辭。可見武丁時期不但派兵征伐陝西的周國，他甚至卜問是否御駕親征。

前文論述，太王遷岐，定居周原，不會早於殷墟三期，即武丁的孫子輩，則武丁所伐之「周」，當另有其人。《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引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可見「周」原來乃岐下的一個邦國，其地謂之周原，武丁所伐即是這個周國。太王之族遷岐以前不名爲「周」，可能稱作「豳」（邠），今本《竹書紀年》云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今本《竹書》雖是明人僞作，但邠侯之稱合乎古代諸侯國名體例，恐怕是有所本的。太王祖先既都於邠，故稱邠侯，遷居周原後，才改稱周侯，而上舉卜辭商所征伐之「周」，都是周原的土著部族。西安以西至今只見典型殷墟之器物而未見二里岡文化，可能是武丁「撲周」後，商王朝勢力才進入這一帶。但這個周國到殷墟三期大概已頗式微，遂被太王取代，今日所見殷商卜辭，鮮有太王的周，要等到周原甲骨出土，才是歷史文獻的周族。

太王率其族人及追隨部衆逾過梁山，沿漆水西上，所經之地多商文化的遺迹。醴泉縣朱馬嘴1977年發現一批青銅器與陶器，銅器計大、小鼎，甗、爵、觚、直內戈、鏃各一件，陶鬲三件和殘片。銅、陶器都具備商代前期的特點（秋維道1980），這裡是一處居住遺址，1972年也出土一件時代風格相似的銅鼎（《陝西》一，頁57）。1971年同縣汭河壩發現二鼎三簋，具有商代中晚期的特徵（秋維道、孫東位1980）。則從商代前期以下，醴泉已有商人，至少商文化已波及此地。岐山京當1972年發現的窖穴，出土銅器戈、爵、斝、觚、鬲各一件，屬於殷墟早期（《文物》1977：12）。至於武功、扶風以西到岐山一帶，出土不少商晚期的銅器。不過，考古學界所謂「商晚期」通指殷墟二百七十三年，太過籠統，其中有些屬於殷墟三期以前。[19] 某些同出器物包含多種不同族徽，固有可能是周人克殷後掠奪的古董，但綜觀周原及其以外地區，現在發現的商器已非少數，

19.《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著錄周商器，No.15-19岐山禮村同坑共出5件銅器，五種習見的商代族徽。No.20-21岐山賀家村同坑共出銅器2件，兩種習見商代族徽。No.22-40賀家村M1出土銅器35件，有兩件商代族徽。No.41-46扶風法門鎮商代晚期墓出土銅器8件，No.47-49呂宅村商代晚期墓共出銅器3件，No.51白龍村商晚期墓出土司母姒康鼎，可能是某商王后妃之物，No.125-136武功浮溝村同出土青銅禮7件、生產工具、兵器及車馬器14件，應爲墓葬，有商代族徽。

有的是窖藏，有的是墓葬。這些考古資料顯示，太王遷岐之前，周原附近已有不少政治實體，所以他大概也和祖先公劉定居於豳一樣，「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大雅・公劉》），是一種武裝殖民。

太王是文王的祖父，武王、周公的曾祖，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族三代在關中的發展，對周初諸賢而言，非親目所睹即親耳所聞，譜成詩歌，容有誇張成分，但亦傳達不少史實；尤其基於上述考古資料的背景，參證《竹書紀年》和周原新出甲骨，當更切實。

講述太王祖孫三代擴張的詩歌主要有《大雅》〈緜〉和〈皇矣〉兩篇。〈緜〉篇贊美太王結束上代竄於戎狄之間的窖洞生涯，在周原營城構屋，開始過著「有家室」的日子。詩曰：

>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第三章）。

這是定居築室。

>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第四章）。

這是田野規劃。

>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第五章）。
>
>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第六章）。

此二章講興築宗廟和宮殿。

>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第七章）。

舊說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則此時宮殿區已範圍起來，築宮牆，另外再立大社的祭壇。貴族有廟，平民有社，象徵國家的建築於是乎具備。

太王及其人民能在岐下周原立足，是靠武力得來的，鬥爭的對象當然是周原的土著，《大雅》謂之混夷或串夷，古來注疏囿於周行仁政之見，故多曲解。[20]

---

20.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鄭《箋》云：「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對「惡人」不禁絕恚惡之心即是戰爭，不廢聘問之禮即是講和。傳統注疏家多把這兩句詩歸於文王，但朱熹《詩集傳》屬之太王是比較正確的。據〈皇矣〉，「作之屏之」之後言大伯王季，接著才說到文王，「作之屏之」等句即是「柞棫拔矣」的闡釋，則〈緜〉篇此章不可能歌頌文王。因爲〈皇矣〉云「天立厥配，

《大雅・緜》曰：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第八章）。

《大雅・皇矣》亦曰：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第二章）。

〈緜〉篇柞棫之拔，〈皇矣〉說得更詳盡，枯木伐盡，灌林平整，清除河柳，剔修山桑，行道於是乎通，混夷遂疲弱困厄，四處奔竄，[21] 叢林壅關和夷狄逃走有何關係呢？我們從考古與卜辭資料知道，周原早有邦國，周初頌詩，正透露周之祖先在此立國的艱辛，〈緜〉篇所謂「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也。殄是止絕，慍是憤怒，隕是停墜，問是聘問。這兩句詩說，太王來到周原，對於原來的土著邦國，既不禁絕他的憤怒，也不停止他的聘問，即是採取亦戰亦和的策略。

〈緜〉篇與〈皇矣〉所說的混夷和串夷是太王立足周原的第一號敵人，舊說或以爲即是犬戎，[22] 但衡情度理，應該就是殷墟卜辭一、二期的「周」。古代族屬，史籍含混，今難詳考，唯從考古文化來看，禮泉朱馬嘴 1977 年出土的高領分襠袋足鬲是典型的「戎式鬲」。扶風劉家村發現的先周墓所出之陶鬲高領、乳狀袋足、分襠，也是「戎式鬲」；墓葬形制有洞室墓，普遍隨葬石頭，一若文獻傳

(續)受命既固」，「受命」二字使注疏家都往文王身上作文章。但「天立厥配」既指〈緜〉篇「古公亶父……至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的太姜（朱熹《詩集傳》），受命云云則借用〈周本紀〉「蓋周自太王興」的說法比較妥。至於周不行仁政，參見沈剛伯先生〈周室果有仁政乎？〉，收入《沈剛伯先生文集》。

21. 此二章字義之疏解參見《詩經》毛《傳》鄭《箋》，唯「串夷載路」之「路」，毛《傳》因「串夷」不作夷狄之名，「路」釋作大，可以不論；鄭《箋》云：「路，應也。天意去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朱熹《詩集傳》云未詳，引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比較可從。但「路」字，《經典釋文》第七〈毛詩音義下〉云：「《詩》本皆作瘣」。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發揮此義，即罷露也；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亦主張釋作瘣。

22. 〈緜〉混夷，《說文》〈馬部〉駾字條引作「昆夷」，〈口部〉喙字條引作「犬夷」。《史記・匈奴列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曰《春秋》以爲畎戎。按畎音犬，大顏云即昆夷也。……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皇矣〉串夷，鄭《箋》云即混夷。然而混夷是否犬戎，丁山便持不同意見。他說：一期卜辭有「犬侯撲周」，足證武丁伐周實以犬侯爲主力。卜辭的「犬侯撲周」雖不能直接牽傅《大雅・緜》的「犬夷喙矣」爲一事，要此犬夷爲商之犬侯，不能如向來經師比附犬戎；《史記》比附爲匈奴，其失更遠（《殷商氏族方國志》犬侯條）。按武丁以犬侯征討周，則犬侯非周明矣，此乃太王以前周原之邦國。卜辭之「犬侯」與《詩經》之「混夷」聯繫的根據是《說文》引詩的一條佚文，其他都是推論。即使文王伐過犬夷，恐怕也不是周原上的混夷，因爲從太王到文王，他們的勢力急遽發展，這點正是本文要討論的。

述之羌人白石崇拜；死者頭部有雙聯小銅泡，可能是髮卡，反映披髮之俗。因此報告者把這裡的土著定作姜戎（《文物》1984：7）。是不是羌族尚待證實，但屬於文獻上廣義的戎狄，大概是無疑的。

太王長途跋涉，相地而居，所率同姓及異姓之部衆不可能太多，所以首先他們面對周原的土著大概也非「不隕厥問」不可。但太王到底不是甘於雌伏之輩，自然「不殄厥慍」，相機擴張。總的來說，就如孟子的評論，太王是位「智者」，這時期他對附近邦國部族採取「以小事大」的策略（《孟子・梁惠王下》），和某些羌戎聯盟、結親，但也和另外一些戎狄鬥爭。

太王在周原立足後，逐漸發展，可能是殷墟四期卜辭（《卜辭通纂・別二》桃山）之「周」，才是這一族群，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熟悉的周。太王子孫以周原爲據點，向外擴張，傳統文獻與新出周原甲骨都有相當清楚的記載。卜辭四期大約相當於太王之子季歷的時代，周已不再是不敢廢鄰國聘問之禮的小邦，而是大肆其「不殄厥慍」之新興勢力了。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季歷即位，三年後敗程于畢，越六年伐義渠，俘獲其君。根據古本《竹書紀年》，季歷一生主要爭戰的對象是戎狄。古本《紀年》（范祥雍 1962，頁 22-23）曰：

武乙三十五年　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大丁二年　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　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
七年　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　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大丁乃成湯之子，當是文丁之誤。因爲古本《紀年》文丁死於十一年，此前殺季歷，故上引之「周人」都在季歷的時代。而「周王季歷」之「周王」，不知出自先秦原本，或李賢注《後漢書・西羌傳》引證時所加，今本《竹書紀年》皆作「周公季歷」，雖不知何據，但「周公」比「周王」合理。周人實際稱王不早於文王，「太王」與「王季」之「王」都是追尊（《史記・周本紀》）。西落、余無、始呼、翳徒，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云地系未詳，可能不出今日陝甘一帶；唯燕京，若如雷氏所考在今山西太原，季歷之敗師亦顯見此時周人勢力尚無法遠及山西省。《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徐廣曰：「王季宅程」。季歷滅畢國而建程邑，在今陝西咸陽縣東（陳槃 1969，册四，頁 330），今本《紀年》列於文丁五年。《逸周書・程典》說文王曾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而作〈程典〉。可見這裡是季歷到文王期間周人向外擴張的另一據點。

《大雅・皇矣》說：「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奄有四方

」。「對」字或謂墾闢，或謂封疆，[23] 皆通。奄有四方固是頌詩誇辭，但周人自王季邦國始大則是紀實。〈皇矣〉贊美季歷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第四章）。

貊，《左傳》與《韓詩》作「莫」。《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成鱄解釋這章說：「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悔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在周初諸賢的心目中，季歷是一位開創性的君長，周族在他領導下迅速強大，爲文王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這支新興周族對商王朝隱然形成威脅，文丁首先採取籠絡手段，册命季歷爲殷牧師，但眼看季歷仍不斷擴張，終於放心不下，將他除掉。同年，文丁也去世。[24] 古本《竹書紀年》云，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大概是文王守喪後象徵性的復仇行動，此時周比商之力量恐怕尚差一截。檢覈新舊文獻，文王先在關中發展，後來才逐漸進入晉南、豫西，而遠及河內，但對商王朝仍維持臣服的關係。

周原新出甲骨，尤其岐山縣鳳雛村西周甲組房基西廂第二房H 11的發現，[25] 有不少資料可以說明克殷以前周人的活動及當時的商周關係（參圖一四）。關於册命之刻辭（用王宇信摹本）有

1.貞王其奉又（侑）

大甲𠂤周方

白𢦏囚正

---

23. 對，《說文・羊部》云：「从羊口，从寸。」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二〈釋對〉肯定陳公培云「對義當與邦近」，而引《左傳》以證。《左傳》宣公十二年記楚之始興曰：「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昭公十六年記鄭之始建曰：「鄶次比輯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處之」，皆《說文》从寸从羊之義。推測楊氏之意，蓋指墾闢。唯白川靜《甲骨金文學論叢》八集〈羣羣關係字說〉指出「對」金文多作𡍮（頁130）。按此字右半是手，左半合「業」「邦」之主要字形。業，林義光說是笏，高鴻縉推測爲古之兵器，朱芳圃云照明之鐙，張日昇疑爲符節，於「作邦作對」義皆不當（參見周法高《金文詁林》311條），唯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二從「封」字立說，比較切近。李氏認爲「對」是封的本誼，對字从羊，許慎訓作戴生艸，封字从，意同，亦象手持羊樹之形（頁771）。

24. 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據《通志・三王紀》「太丁在位三年，崩」，《注》引《紀年》曰十一年，補古本《竹書紀年》，定文丁陟於十一年。今本《紀年》作十三年陟。

25. 鳳雛甲骨摹本多家，見徐錫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見人名、官名、方國、地名淺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979；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陝西鳳雛村兩次發現周初甲骨文〉（龐懷清、巨萬倉），《考古與文物》1982年3期；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本文引證資料以王氏摹本爲主。

不𠂇（左）于受

又又（有佑）(H11:84 圖12)

2.……文武

……王其邵帝（邵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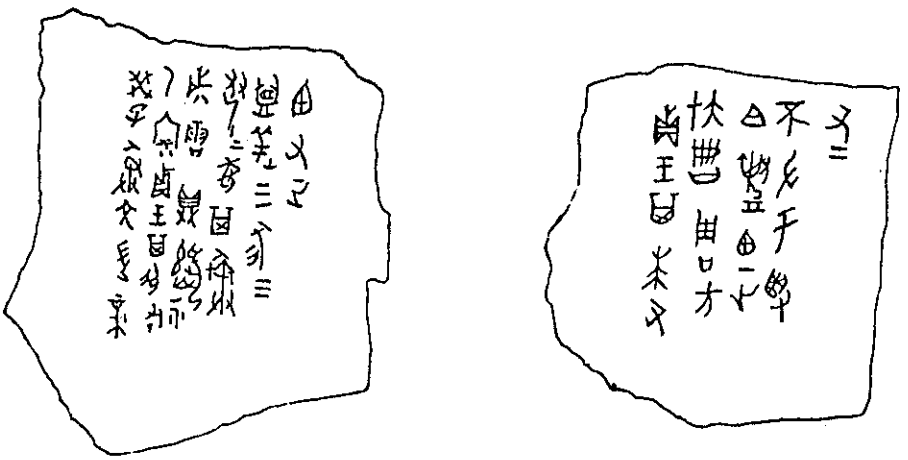
……𠂤（天？）口口典册

周方白……由

正亡𠂇（左）……

……王受又又（有佑）（H11:82 圖14）

殷王行𠂤、禘之祭時册命周方伯。周方伯即是周文王，古書謂之「西伯」。此伯非公侯伯子男之「伯」，而如周襄王册命晉文公爲「侯伯」之「伯」（《左傳》僖二十八），即諸侯之長，鄭衆所謂「長諸侯爲方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也。文王爲方伯，其時周在殷商王朝諸侯中的地位，比之乃父季歷之爲殷牧師者似乎提高許多。商周關係實甚密切，故周原出土祭祀殷商先王的刻辭。



圖一四　周原甲骨

（根據《文物》1979:10）

3.癸巳彝文武帝

乙宗貞王其邛（邵）祭

成唐鼎（貞）禦

𡚒二母其彝

血羌三豕三白又正（H11:1 圖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彝文武丁升
貞王翌日乙酉
其𠂤𠂤中
……〔文〕武丁豐
……示卯
…… 王（H11:112 圖9）

第三條「禦𡚒二母其彝血」云云，辭似我方鼎或我簋銘，銘曰：

隹十月又一月丁亥
我乍（作）御血且（祖）乙匕（妣）乙
且（祖）己匕（妣）癸我衧繫
二母咸𡚒遣福二
𠂤貝五朋用乍
父己寶尊彝 亞（形中）若（《三代》4.21.1，10.43.2）

我鼎簋之「二母」蓋指妣乙妣癸，則第三辭卸祭的二母可能是文武帝乙及成湯之配偶。文武帝乙即帝乙，紂王之父，則此片所祭乃殷商開國之王與紂王之禰，以及他們的夫人。第四辭的文武丁是文丁。在文丁廟宮祭祀，次日，王舉旂，饗醴。

周人的甲骨刻辭所載祭祀商王成湯、文丁與帝乙的王是誰呢？有人以爲商王，即商紂王，主要理由是所行祭祀皆是殷禮，而且「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沒有姬姓之周人祭祀子姓之商王的道理（李學勤、王宇信 1980）。另一種「商王說」認爲上舉四辭都是記事刻辭，周人記其事以告于自己宗廟而後歸檔入庫的。第一、二、四三辭反映帝辛册命文王爲周方伯的全部過程，先郊祀上帝（第二辭），次求侑太甲（第一辭），第三乃在稱旗大典上頒布册命（第四辭）（田昌五 1989）。但也有人主張這第三、四刻辭的王指周文王，唯無論證（徐錫台 1979b）。上舉第一、二刻辭命周方伯的王顯然是商王，三、四刻辭設定作商王，於辭亦順，不過主張商王說的理由並不絕對，主張周文王者亦非毫無根據。周原甲骨單言「王」的成句刻辭，毋寧指周文王比較妥當，如

5.今𩵦（秋）王
克𠂤（往）𡰥（密） （H11:136圖22）
6.王其𠂤（往）𡰥（密）
山𠂤 （H11:80 圖24）

前往密國之王可能是周文王，尤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衣王田
至于帛
王隻（獲）田 （H11:3 圖27）

衣王即殷王，服侍殷王田獵的王，當非周文王莫屬。《史記・周本紀》說：「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西伯昌受命稱王，現在獲得第一手史料的佐證。當時周既然尚不能與商王朝抗衡，西伯且不免羑里之囚，豈能拒祀商之先王，何況商周又有隸屬關係！至於所謂殷禮更不成理由，商既爲天下共主，其祭儀豈只行於商族或商之王畿而已？

當然，嚴格說，第三、四兩辭的王，是周文王或是商紂王尚難定論，但不論那種說法，都顯示周人在克殷以前對殷商的臣服關係。周經過季歷的經營，勢力擴張，至文王乃奠定與商王朝抗衡的地位，遂從西方諸侯中脫穎而出，引起商王的疑慮。這方面文獻記載比較詳細，據《大雅・皇矣》，當時周人首先要剷除的對象有密和崇。〈皇矣〉曰：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第五章）。

密，即密須氏，屬漢安定郡陰密縣，今甘肅靈台縣西。阮、共皆在密須附近。「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下》作「以遏徂莒」，《韓非子・難二》云「克莒」。莒地不詳，但應與密阮共相近，都在涇水上游，屬漢之安定郡（朱右曾《詩地理徵》卷五）。《史記・周本紀》記載文王之武功，首述征伐犬戎和密須，大概先安頓後方，以便東出與商爭霸。周人重新掌握涇水中上游，儼如一方盟主，詩人誇張，自然唱出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皇矣〉第六章）

的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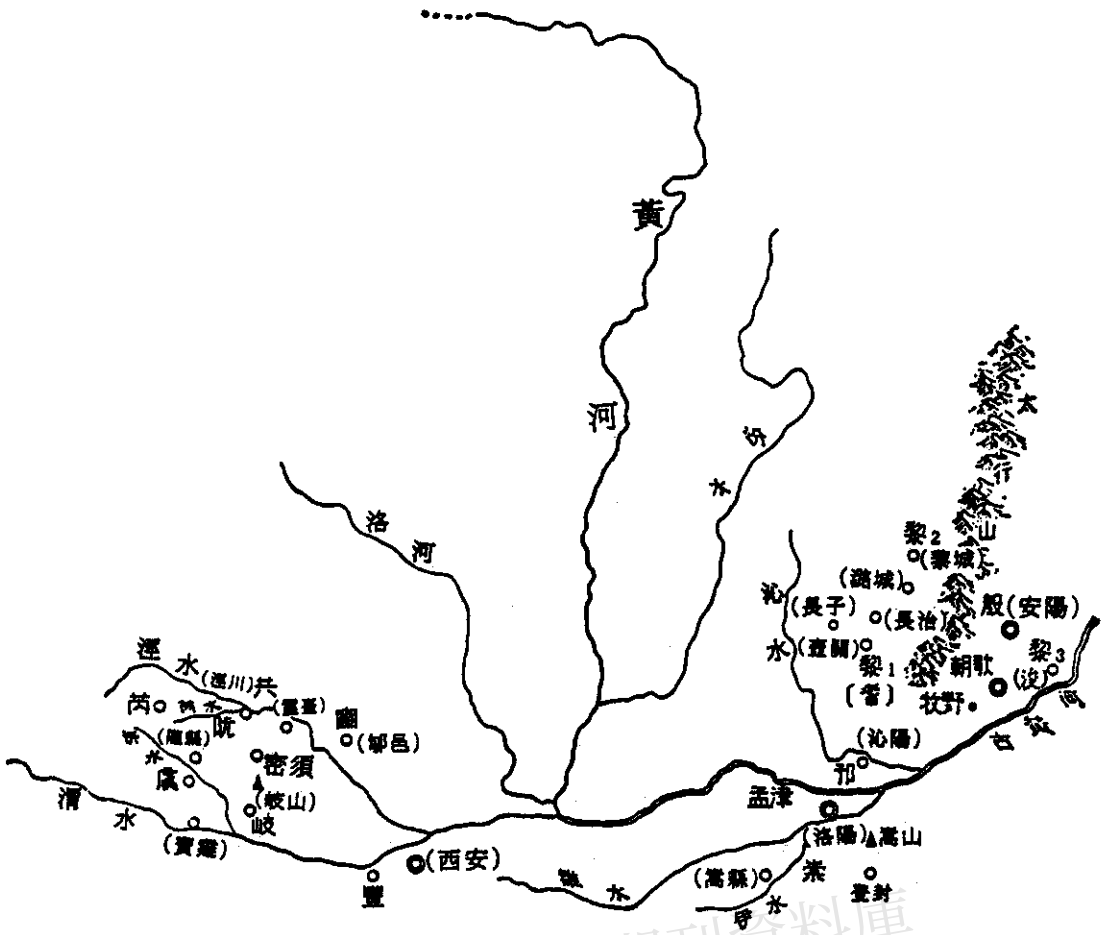
周人東進，目標是晉南和豫西，主要邦國有黎、邘和崇。《尚書・西伯戡黎》的黎，《尚書大傳》和〈周本紀〉作耆，〈殷本紀〉作飢，一本寫作阢。《續漢書・郡國志》上黨郡曰：「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李賢注云「文王戡黎即此也」。黎在今山西長治市南壺關境內（顧頡剛、劉起釪 1980）。邘，或作「于」，《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又作盂，《韓非子・難二》云「文王侵盂」，殷墟五期卜辭有盂方伯（《甲》2416）。《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野王縣師古注引孟康曰：故邘國，漢有邘亭，在今河南省沁陽縣。《大雅・文王有聲》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周本紀〉曰：「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在周人發展過程中，邘與崇幾乎占有相當的地位，〈皇矣

〉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第七章）。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第八章）。

（　）一今地名



圖一五　周文王向東發展示意圖

（根據顧頡剛、劉起釪〈尚書西伯戡黎校釋譯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春秋宋國司馬子魚謂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左傳》僖十九）。從《大雅》的描述，崇國是一勢力強大之城邦，其地皇甫謐根據上引〈文王有聲〉而推測可能在豐鎬之間（〈周本紀正義〉），但「崇」或作崈，俞樾疑當屬漢潁川郡的崇高，即今河南嵩縣（陳槃 1969，冊四，頁 379）。到此階段，周人勢力已出函谷關矣，引起商人極大的恐懼（《尚書・西伯戡黎》）（參圖一五）。

《逸周書・程典》說：「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孔子亦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近人徐中舒論證，當季歷、文王之世，周人勢力已及江漢（1936）。姑不論六州是否說明天下三分之二，文王時代周已成爲大國是無可置疑的，上距他們初來周原定居，不過兩代而已。《大雅・緜》曰：

>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第九章）。

疏附，先後、奔奏、禦侮都是各種不同性質的歸順人群或附庸小邦，伐崇之後，文王在今鄠縣東邊建築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去世（〈周本紀〉），克殷大業便落在其子武王身上。《逸周書》〈大開武〉、〈小開武〉和〈酆謀〉三篇透露武王夙夜圖謀殷商，周和商的這場爭霸戰避免不了，但商紂王似乎沒有足夠的警覺。

*　　*　　*

先周文化的探索是八〇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與古代史研究的新課題，至今尚無定論，本文先釐清周人先公先王的年代和地理，時間上限至夏末，活動地區以涇水中上游爲主，在這時空範圍內尋找可以對應的考古學文化。

對於目前各家的論辯，我們認爲姬周文化可能與甘肅平涼、慶陽地區屬於商代的土著文化淵源較深，此與胡謙盈的見解比較接近，但是否爲寺洼文化，尚可斟酌。等到殷墟三、四期之際，太王殖民於岐下時，與寶雞地區源自辛店文化的土著融合，其中一大支是姜姓戎狄；姬姜聯盟，或許是「寺洼」和「辛店」戎狄文化的結合。關於姜族文化，我們的意見和鄒衡部分雷同，亦酌取盧連成的看法，但與他認爲姬周源出「辛店」不同。鄒衡論先周文化一開始就考慮關中商文化的因素 (1980，頁 316)，當比客省莊二期較切實際，但與山西地區的文化則無直接淵源。姬姜聯合，先則征服二里岡期以來就在關中東部發展的商文化及其部族，繼而吸收招納之，於是搏凝成「西土之人」(杜正勝 1991)，東進與商王朝爭霸。

先周的關中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地區，同在扶風縣境，劉家出土高領乳狀袋足鬲，北呂則發現聯襠鬲。相去不遠的武功鄭家坡又與北呂一致，具有商文化的特徵。克殷以前關中地區的文化要素，除西方的寺洼、辛店文化外，還有東方的商文化。今日考古學文化的概念只是大致的分類，每一種文化可能包含多種部族。他們之間透過戰爭或和平手段而達成文化與部族之融合，當遠比文獻所傳或考古資料所見者複雜。

上述益家堡三層疊壓，最上層袋足鬲、聯襠鬲共出，可以作爲融合過程的標本。但時代愈後，商式的聯襠鬲在關中愈居主流，澧西所見陶鬲多數是聯襠鬲，下迄西周，袋足鬲終於消失。先周與西周陶鬲不同恐與文化擅遞有關，非單純的器物形制內在之轉變規律而已（胡謙盈 1982）；不僅陶器，西周早期的青銅禮器也反映「吾從商」的現象（陳芳妹 1986）。從考古資料來看，周人雖然克商，占軍政優勢，但文化方面似仍因襲商人舊制，到西周中期，周文化的特質才顯明。

書　目

一、專　書

王宇信　1984　《西周甲骨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史念海　1981　《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聯書店。

朱右曾　　《詩地理徵》卷五，（在重編本《皇清經解續編》第七册）。

呂思勉　1982　《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孝定　1965　《甲骨文字集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玄伯　1939　《中國古代社會新研》，北平，孔德研究所。

辛樹幟　1973　《禹貢新解》，北京，中華書局。

沈剛伯　1982　《沈剛伯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日報出版部。

周法高　1974　《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

范祥雍　1962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承珙　　《毛詩後箋》，（在重編本《皇清經解續編》第 4 － 5 册）。

胡　渭　　《禹貢錐指》，台北，商務印書館。

俞偉超　1985　《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徐旭生　1960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

島邦男　　《殷墟卜辭綜類》，台灣大通書局影印。

馬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在重編本《皇清經解續編》第 4 册）。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許倬雲 1984 《西周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陳 奐 《詩毛氏傳疏》，台北，學生書局影印。
陳 槃 1969 《春秋大事表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夢家 1956 《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
崔 述 《豐鎬考信錄》，收入《崔東壁遺書》，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楊樹達 1954 《積微居小學述林》，科學出版社，台灣大通書局影印。
雷學淇 《竹書紀年義證》，台北，藝文印書館。
董作賓 1965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附册》。
董作賓 1976 《殷墟文字甲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聞一多 《神話與詩》，台中，藍燈文化公司影印。
閻若璩 《四書釋地續》，（在重編本《皇清經解》第 17 册）。
劉隨盛、梁星彭、紀宏 1988 《武功發掘報告——滸西莊與趙家來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盧連成、胡智生 1988 《寶雞強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譚其驤主編 1982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2 册，上海，地圖出版社。
蘇秉琦 1984 《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戴 震 《毛鄭詩考正》，（在重編本《皇清經解續編》第 6 册）。

二、論 文

王玉哲 1982 〈先周族最早來源于山西〉，《中華文史論叢》1982 年 3 期。
王永光 1977 〈陝省岐山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1977 年 12 期。
尹盛平、任周芳 1984 〈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 年 7 期。
尹盛平 1990 〈先周文化與周族起源〉，田昌五主編《華夏文明》二，北京大學出版社。
左忠誠 1987 〈渭南市又出土一批商代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7 年 4 期
白川靜 1958 〈𠂤𠂤關係字說〉，《甲骨金文學論叢》八集（油印本）。
石璋如 1948 〈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 本下。
石璋如 1956 〈關中考古調查報告〉，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7 本。
田昌五 1989 〈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關係〉，《文物》1989 年 10 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資料庫

李伯謙 1983 〈城固銅器群與早期文化〉，《考古與文物》1983 年 2 期。
李 峰 1986 〈試論陝西出土商代銅器的分期與分區〉，《考古與文物》1986 年 3 期。
李學勤、王守信 1980 〈周原卜辭選釋〉，《古文字研究》四，北京，中華書局。
宋新潮 1989 〈試論陝西出土的商代銅器〉，《文博》1989 年 3 期。
杜正勝 1979 〈周代封建的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 本 3 分。
杜正勝 1982 〈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 本 4 分。
杜正勝 1991a 〈牧誓反映的歷史情境試析〉，《大陸雜誌》82 卷 1 期。
杜正勝 1991b 〈夏代考古及其國家發展的探索〉，《考古》1991 年 1 期。
沈剛伯 1982 〈周室果有仁政乎？〉，收入《沈剛伯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日報社出版部。
呂智榮 1987 〈試論陝晉北部黃河兩岸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及有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週年》，西安，三秦出版社。
林 澐 1987 〈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蘇秉琦主《考古學文化論集》1，北京，文物出版社。
姚生民 1986 〈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 年 5 期
保 全 1981 〈西安老牛坡出土商代墓地的發掘〉，《考古與文物》1981 年 2 期。
秋維道、孫東位 1980 〈陝西醴泉縣發現兩批商代銅器〉，《文物資料叢刊》(3)。
胡謙盈 1982 〈姬周陶鬲研究〉，《考古與文物》1982 年 1 期。
胡謙盈 1986a 〈姬周族屬及其文化探源〉，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
胡謙盈 1986b 〈試論先周文化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胡謙盈 1987 〈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窺〉，《考古與文物》1987 年 1 期。
胡謙盈 1990 〈淺談傳說中的周都與先周文化的分布——姬周氏族起源的探索〉，田昌五主編《華夏文明》二，北京大學出版社。
段紹嘉 1963 〈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文物》1963 年 3 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烏　恩　1984　〈論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的淵源〉，《考古與文物》1984 年 4 期。

徐中舒　1936　〈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 本 2 分。

徐天進　1990　〈試論關中地區的商文化〉，《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徐錫台　1979a　〈早周文化的特質及其淵源的探索〉，《文物》1979 年 10 期。

徐錫台　1979b　〈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見人名、官名、方國、地名淺釋〉，《古文字研究》第 1 輯。

徐錫台　1980　〈岐山賀家村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 年 1 期。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　1980　〈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1980 年 3 期。

陳全方　1982　〈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 10 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

陳芳妹　1986　〈青銅藝術所見商周文明的關係〉，《東吳大學中國藝術集刊》第 15 卷，台北，東吳大學。

陳芳妹　1991　〈故宮所藏殷至周初的異形兵器——兼論殷墟與北方及西南文化關係問題〉，《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待刊)。

張忠培　1980　〈客省莊文化及其相關諸問題〉，《考古與文物》1980 年 4 期。

張長壽　1980　〈一九六七年長安張家坡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 年 4 期。

張長壽、梁星彭　1989　〈關中先周青銅文化的類型與周文化的淵源〉，《考古學報》1989 年 1 期。

馮漢驥　1980　〈四川彭縣出土的銅器〉，《文物》1980 年 12 期，收入《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楊錫璋　1983　〈安陽殷墟三家莊東的發掘〉，《考古》1983 年 2 期。

齊思和　1946　〈西周地理考〉，《燕京學報》第 10 期，收入《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

解希恭　1962　〈光社遺址查試掘簡報〉，《文物》1962 年 4、5 合期。

盧建國　1982　〈陝西銅川發現商周青銅器〉，《考古》1982 年 1 期。

盧建國、鞏啓明、尚友德　1984　〈陝西耀縣北村商代遺址調查記〉，《考古與文物》1984 年 1 期。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料庫

盧連成　1983　〈寶雞茹家莊、竹園溝墓地出土兵器的初步研究——兼論蜀式兵器的淵源和發展〉，《考古與文物》1983 年 5 期。

盧連成　1985　〈扶風劉家先周墓地剖析——論先周文化〉，《考古與文物》1985 年 2 期。

盧連成　1986　〈先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陝西省考古三十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論文（ 1988 年 11 月）。

盧連成、陳昶　1984　〈長安澧西早周墓葬發掘記略〉，《考古》1984 年 9 期。

劉士莪　1988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初論〉，《文物》1988 年 6 期。

劉寶愛、嘯鳴　1989　〈寶雞市博物館收藏的陶鬲〉，《文物》1989 年 5 期。

鞏啓明　1989　〈關于客省庄文化的若干問題〉，田昌五、石興邦主編《中國原始文化論集——紀念尹達八十誕辰〉，北京，文物出版社。

樊維岳　1987　〈藍田出土一組西周早期銅器陶器〉，《考古與文物》1987 年 5 期。

樊維岳、吳鎮烽　1980　〈陝西藍田縣出土商代青銅器〉，《文物資料叢刊》(3)。

錢　穆　1931　〈周初地理考〉，刊於《燕京學報》第 10 期。

鄒　衡　1979　〈論先周文化〉，《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鄒　衡　1980　〈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鄒　衡　1988　〈再論先周文化〉，西北大學《周秦漢唐考古與文物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增刊。

霍巍、黃偉　1989　〈試論無胡蜀式戈幾個問題〉，《考古》1989 年 3 期。

韓偉、吳鎮烽　1982　〈鳳翔南指揮西村周墓的發掘〉，《考古與文物》1982 年 4 期。

謝端琚　1980　〈甘肅永靖張家嘴與姬家川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 年 2 期。

謝端琚　1987　〈試論我國早期土洞墓〉，《考古》1987 年 12 期。

羅西章　1978　〈扶風美陽發現商周銅器〉，《文物》1978 年 10 期。

羅西章、張天恩　1984　〈扶風北呂周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4 年 7 期。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龐懷清、巨萬倉 1982 〈陝西鳳雛村兩次發現周初甲骨文〉，《考古與文物》1982 年 3 期。

顧頡剛、劉起釪 1980 〈尚書西伯戡黎校釋譯論〉，《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 1 輯。

三、期　刊

《文物》

1976 年 1 期 〈一九六三年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遺址的發掘〉。

1976 年 2 期 〈盤龍城商代二里岡期的青銅器〉。

1977 年 12 期 〈陝西省岐山縣發現商代銅器〉。

1984 年 7 期 〈陝西武功鄭家坡先周遺址發掘簡報〉。

1984 年 7 期 〈扶風劉家姜戎墓葬發掘簡報〉。

1984 年 7 期 〈扶風北呂周人墓地發掘簡報〉。

1988 年 6 期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發掘〉。

《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 10 期 〈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

《考古》

1959 年 11 期 〈陝西渭水流域調查簡報〉。

1960 年 1 期 〈陝西邠縣下孟村遺址發掘簡報〉。

1960 年 3 期 〈陝西鳳翔、興平兩縣考古調查簡報〉。

1962 年 6 期 〈陝西涇水上游調查〉。

1962 年 6 期 〈陝西邠縣下孟村仰韶文化遺址續掘簡報〉。

1964 年 3 期 〈1962 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簡報〉。

1976 年 1 期 〈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

1979 年 3 期 〈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

1980 年 4 期 〈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七）〉。

1981 年 3 期 〈隴東鎮原常山遺址發掘簡報〉。

1982 年 6 期 〈甘肅庄浪徐家碾寺注文化墓葬發掘紀要〉。

《考古學集刊》

2 集 1982 年 〈陝西綏德發現和收藏的商代青銅器〉。

6 集 1989 年 〈陝西長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遺址發掘記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專刊報告

《武功發掘報告——濯西莊與趙家來遺址》 198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陝西省出土商周青銅器（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殷墟婦好墓》 19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